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

WILL THE
REVOLUTION BE
TELEVISED

A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Media

[英] 约翰·莫利纽克斯
(John Molyneux)



媒体的 马克思主义 分析

杨倩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8-7515号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

► 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

交往批判理论：
互联网时代重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
霍耐特和哈贝马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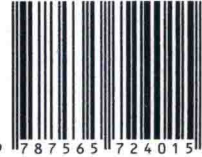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与媒体研究：
关键问题及当代趋势

上架建议：新闻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二维码

ISBN 978-7-5657-2401-5



定价：35.00元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

媒体的 马克思主义分析

WILL THE REVOLUTION BE
TELEVISED
A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Media

[英] 约翰·莫利纽克斯 (John Molyneux) 著 杨倩 译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 (英) 约翰·莫利纽克斯 (John Molyneux)
著; 杨倩译. —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11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
ISBN 978-7-5657-2401-5

I. ①媒… II. ①约… ②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3293 号

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MEITI DE MAKESI ZHUYI FENXI

著 者 [英] 约翰·莫利纽克斯 (John Molyneux)
译 者 杨 倩
策划编辑 曾婧娴
责任编辑 曾婧娴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6.5
字 数 12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401-5/G·240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刘东建

执行主编：杨 倩

编委会委员：段 鹏 张 付 隋 岩

鲁 路 雷跃捷 刘东建

王锦刚 任孟山 杨 倩

约翰·莫利纽克斯，社会主义作家、活动家，曾任朴茨茅斯大学讲师，现居都柏林。他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政党》（1978）、《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什么？》（1985）和《伦勃朗与革命》（2001）。他还是英国和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

出版说明

该书是英国经典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关媒体批判方面的新作，其对资本主义媒体的批判在西方社会可谓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本书作者约翰·莫利纽克斯是英国的学者和作家。他退休之前曾经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隐退到爱尔兰之后成为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积极分子。他曾经是大学讲师，组织过抗议伊拉克战争、反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等方面的政治运动。他写的公告《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民主》备受关注，文中表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更加民主的观点使得英国共产党将其称为“忠诚的反叛者”。他还开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艺术的”为主题的博客。他的著作《关键是改变世界》入选泰特的利物浦展览“艺术向左转”，展现了艺术在改变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作者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来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西方左翼的代表人物。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他尽可能地以合法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他所处的环境与他所采用的方式都有着特殊的背景，因此在某些观点的表述上稍显偏激，但为了保持原貌，为研究者提供一手的参考资料，本书出版时未作处理。所以在阅读这本书时，请联系上下文，不宜脱离语境。阅读时请细加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序

中国传媒大学一直以培养信息传播领域高层次人才为己任，为党和国家的传媒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及传媒人才的摇篮”“信息传播领域知名学府”。近年来，学校确立了面向未来，走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发展之路。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此为指引，服从和服务学校发展大局，围绕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工程，进一步彰显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基地、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研究高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传媒政治、传媒伦理与道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成果。

2018年恰逢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专题策划、精心筹备的基础上推出了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为主题的译丛。该译丛的出版正当其时，同时也是对世界政治与经济新形势的积极回应。受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得到重新认识和重视，许多长期坚守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的学者陆续出版了不少富有新时代气息的新著作，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热潮。其中在与媒体传播相关的领域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对大众媒体、新闻传播、信息社会和新媒体的新现象进行批判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面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涨的国际学术背景，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同仁们深感责无旁贷，决定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立足于本土情怀的国际视野优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媒学者的学术动态展开了长期关注和跟踪对比，经过审慎考察和仔细甄选，精选了一批学理扎实、立场鲜明、学术规范、具有前瞻性、业界反响良好的外文著作，组织了翻译队伍对其开展攻关研究，积极推进了相关领域的教研工作和学科建设。该译丛的出版对于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长远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一是将填补国内相关学术译界的前沿空白；二是将丰富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三是将为建构中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张付教授，她的事业使命感让她敏锐地意识

到发起和促成该套译丛的重大责任，并全力寻求多方支持、亲自督阵、周到安排；感谢杨倩副教授，她积极参加策划、甄选、翻译、联络等工作；感谢已经承担翻译任务的王锦刚副教授、吴俊博士等青年教师，他们的辛勤付出使得该套译丛得以稳健推进；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同仁，是他们孜孜不倦的工作，使得该译丛能够有条不紊地如期出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应有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外学来的科学真理。我们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科学理论。相信该译丛的出版，能够通过比较甄别、去伪存真，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批判译丛》编委会

2018年10月

导 读

新媒体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媒体发挥了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功能，成为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第四权力”。这项试图体现相对独立性的权力其实仍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西方社会必然体现资本逻辑。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英国舆论媒体时所指出的：“舆论在一般问题上能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吗？舆论的权力不是仅限于个别场合和仅仅对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吗？”这种批评揭示了西方媒体的普遍现实，“第四权力”往往沦为西方媒体集团垄断的资源，难以充分体现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公共精神，甚至在单向度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的趋势下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因捍卫公共精神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方面乏力，且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主要追求，西方媒体被诸多评论家质疑为滑入资本逻辑苑囿的、猎取受众好奇心的吞币机器，因而成了为资本逻辑代言的社会力量。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媒体的权力幻象，揭示现代社会的异化景观——日常生活因资本逻辑而扭曲为货币的各种符号，长期处于异化状态的现代人感到人格的缺憾和自由的困境，体现了文化批判的独特价值。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方面作出不俗的努力，他们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形式的过程中试图实现文化重塑，使工人阶级和底层大众自主地表达情感和观念，摆脱资本逻辑笼罩下的文化统治。

英国政论家约翰·莫利纽克斯以更直接的方式批判西方媒体的资本逻辑，他通过分析大量媒体资料和案例，批判西方媒体产生偏见的实质、根源及其影响，出版了《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这部体现西方左翼政论家浓重批判力度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如何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如何只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从而塑造了大众的媒体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大众生活。

莫利纽克斯的分析紧密围绕诸如“默多克窃听丑闻”等英国媒体的若干事件展

开，因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直面西方媒体的真实。媒体实现自身的社会功能，无疑基于对当下真实的记录，因而具有历史价值。但是，当人们随作者的笔触走近英国媒体的若干事件，发现西方媒体失真的情景时，可能更新对西方媒体的认识：当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展现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时，必然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底层大众的抗争，为统治阶级的既定利益服务，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在制造认同的过程中烘托出一种“必要的假象”。

因此，探究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必要将一部分过失归咎于西方媒体。因为西方媒体为公众的判断和选择提供了一些“常识”，这些被修饰和包装的“常识”误导了公众，形成了一些有问题的公众意见。莫利纽克斯认为，西方媒体已经深陷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之中，而纯然公正的、中立的、不带偏向的报道其实并不存在。西方媒体持有诸多偏见的本质在于资本逻辑的束缚，因为它从根本上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造就的。西方媒体具有强烈的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因而有些声称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独立报道实际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形象而精心策划的谎言，这些偏见左右了媒体报道的风格和内容。

莫利纽克斯为此分析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技术化手段，例如以生产“娱乐化”节目的方式传播意识形态，在娱乐节目中表达政治立场，通过现金奖励“诱惑”底层大众做出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形成了各种“真实”的幻象。流行的肥皂剧为大众展现了一种“真实”的生活，但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平凡生活其实并不值得过。作者以《东区人》为例说明，它的主人公并不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剧中少数族裔代表不足甚至被忽略了，这导致该剧展示了几乎完全非政治化的生活图景。这与伦敦东区长期以来“格外政治化”的实际并不相符，在这里发生过的历史上重要的工人运动都被隐去了，貌似“无政治倾向”的政治倾向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做法被作者视为所有肥皂剧和大众媒体的“典型”。

广告在新媒体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媒体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强化了媒体的意识形态立场。广告与西方媒体之间的互动，促进了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维护资本主义的西方媒体在广告收入上颇为可观，而左翼媒体的广告则聊胜于无。其中也反映了媒体对传统权力的依赖关系，依赖传统权力的媒体当然不能纯粹体现公正立场。在莫利纽克斯看来，广告文化其实是一种惯常“撒谎”的文化，人为策划的广告内容和花言巧语的广告语言都是推销商品的包装。如同播放广告一样，媒体输出的内容只是他们想让公众知道的，这些被精心策划的内容塑造了公众的口味，使之不至于产生与上层人士不同的媒体选择。其实质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西方媒体滋养着商品拜物教，加重人们的“异化”，使人们在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中放弃可能的选择，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庸。

西方媒体何以具有这种力量？因为它善于投其所好，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它知道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且以娱乐节目、喜剧和梦幻片捆绑一些观众并使之长期产生精神的依赖，其实质不是传播公共精神、维护公共利益，而是捍卫媒体的利益本能。这些体现利益本能的策划和实施当然都是在暗中操作的，表面上西方媒体还要表明，这些节目都是为受众提供“一勺糖”，殊不知，这勺糖只是“有助于服下苦药”。莫利纽克斯进而分析西方媒体的权力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大众的想法。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指出以公众名义标榜自身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是由资本的利益集团控制的工具，体现着明显的政治力量。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几乎不能脱离媒体而存在，与媒体相伴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统治人们精神的力量。当媒体体现较强的政治倾向的时候，必然对公众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不能轻易操纵受众的政见，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至少成为形成公众意见的因素之一，甚至成为很关键的因素，因而西方政党十分重视媒体的力量。

莫利纽克斯还指出，媒体对某类事件缺乏直接经验的受众影响力最强，对具有直接经验的受众影响力最弱。由于缺乏经验，受众倾向于相信媒体呈现的“事实”，进而为媒体的意见所左右。这在西方选举时最为常见，西方媒体有针对性地为受众提供信息，对不同的人群产生有针对性的影响，从而影响选票的流向。所以，有时媒体与其说是在进行报道，不如说是在编排叙事，这些引人关注的故事塑造了公共生活中的“真实”。为此，莫利纽克斯提出应对媒体的策略：既然已无法在生活中大规模拒斥媒体，那么不如在纷繁的意见中甄别是非，识别媒体的意识形态导向，进而更好地运用媒体。

莫利纽克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读懂媒体的最有效的框架，马克思主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分析世界，在不断更新的新媒体时代仍然彰显着批判资本逻辑的现实力量。从现实策略看，应当培养在西方媒体中工作的左翼记者，在媒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信息，进而实现媒体中的斗争。他特别指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现实功能，认为它们已成为潜在的民主化力量，近年来新媒体的潜力在变革运动中增长，在线交流可能会转化为行动。他还分析了群众斗争与新媒体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体控制的斗争可能成为现代革命的关键问题，左翼政党因而需要创立和发展自己的媒体，为公众提供资本逻辑之外的另一种世界观和实践方案。

在全书最后，莫利纽克斯预测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媒体样态，他深知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技术，以及人们的意愿和选择，因而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为了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媒体并为之提供替代方案，他强化了新媒体应有的公共服务功能，描绘了新媒体应有的促进公众参与社会决策的愿景。这时新媒体将不再播放麻醉和迷惑公众的肥皂剧，不再渲染各种远离真实的白日梦，不再加重现代社会的异化，而成

为创造新社会的现实力量。一个大众的、民主的、真实的、互动的媒体，是新媒体发展的趋势，也是作者心仪的媒体样态。综上所述，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媒体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对我们理解西方媒体的本质属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某些具体看法体现了其所处环境和文化立场，与我们熟悉的研究理路未尽一致，读者在阅读中当有所辨别。

五年前，我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访学时，曾在一家左翼书店看到这本书，当时觉得这是研究西方媒体的一部很独特的著作。恰巧在同一时期，本书译者杨倩博士也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访学，于是当时我就建议她将本书译成中文，因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传媒专业的双重知识背景。她愉快地采纳了我的建议，将这本小册子带回北京，遂有了之后找出版社、谈版权、安排翻译的计划。最近，她将精心完成的译稿发给我阅读，并嘱我写一篇解读文章附于书中。我认真读了她的译稿，在感谢她的信任、敬佩她的努力、欣赏其流畅的译笔之余，再次感到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翻译工作，于是有了以上诸字。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7月31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目 录

序 言	001
前 言	005
1 媒体偏见	009
媒体偏见的实质	012
媒体偏见的根源	016
偏见的影响	019
2 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022
游戏节目	025
肥皂剧：《东区人》的案例	029
广 告	035
3 只给读者他们所需要的吗	040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媒体选择	042
一勺糖	046
4 媒体有多强大	049
媒体与统治阶级	050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我们？	054

5 与媒体斗争	063
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斗争	065
利用资本主义媒体	068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070
群众斗争	073
政治组织	075
6 资本主义之后的媒体	077
附 录	081
默多克丑闻——他们的媒体和我们的媒体	081
丑闻事件时间表	084
后 记	086

序 言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与本书主题紧密相关的两个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默多克窃听丑闻”和2011年8月的“伦敦大骚乱”。 1

“默多克窃听丑闻”表明：其一，《世界新闻报》及其新闻集团厚颜无耻；其二，构成统治阶级不同派系的机构（政客、政府、警察、出版机构等），名义上各自独立，实际上却是密切合作的；其三，到了紧要关头，默多克及其集团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难以撼动。如此一来就增强了我的一些主要论点，我也因此在文稿中吸收了一些有关默多克丑闻的评论。我还在附录中收录了我写的有关这一丑闻事件的文章，这是一篇给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报》写的文章。

有关“伦敦大骚乱”的媒体报道，于8月6日星期六在托特纳姆区突然爆发，然后快速蔓延到伦敦的其他区和英国的其他城市，它被证明是俗套报道的典型案列。我在第一章论及有关游行报道时，指出了媒体长期以来如何运作“一种堪比第22条军规的巧妙花招。如果游行进展平静，即使规模很大，通常无法见诸报端……如果相反，出现一点冲撞或者‘动荡’，媒体就会大幅报道，但矛头却完全指向游行”。于是我写道：

曾几何时，相似的媒体“风暴”早已多次被煽动起来对付游行，包括1977年在刘易舍姆区的SWP“社会主义工人党”，即那些从“民族阵线”中分离出来的反法西斯主义者，1984年在欧格里夫区的大批矿工纠察队，1990 2
年的“人头税”暴乱，1999年在威林区“反纳粹联盟”向英国国家党总部行进时与警察对峙，当然，还有2010年11月、12月发生的学生游行。而且，这些风暴总是导致示威者个人被举证或起诉，同时还为“惩戒性”判决做好了准备。

针对大骚乱刮起的媒体风暴异常猛烈而且几乎众口一词。《卫报》已经在线登载

了8月9日星期二这一天各大主要媒体的头版。¹这里提供一些例子：

《每日快报》：“痴人嚣张——恶棍和小偷威胁着英国街道”

《每日邮报》：“暴乱肆虐”，辅以评论框里说的：“谴责镇压是不地道的，如同说风凉话。这简直就是纯粹的罪行。”

《每日电信》：“暴徒的统治”

《独立报》：“暴徒当道”

《每日之星》：“英国的无政府状态”

《每日镜报》：“游民当权”

《都市日报》：“骚乱：躁动四散”

与这些如出一辙的报道相比，唯一例外的说法，是《卫报》相对中立的“为伦敦而战”和《金融时报》独家优先关注的“受美国评级下降影响的股票暴跌”。有意思的是，《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每日之星》都采用同一幅照片，在一辆燃烧的汽车前的蒙面暴徒；《独立报》《都市日报》都刊登了一幅非常相似的照片，在一辆燃烧的汽车前的另外一位骚乱者；《每日电信》《卫报》《每日镜报》则登载同样的照片，从一栋燃烧的建筑跳出来的妇女。换句话说，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重复和强化着政府、警察已经达成的谴责和抨击骚乱者的同盟阵线。

3

这些谴责的核心就是大卫·卡梅伦一口咬定的“纯粹罪行”，也就是认为骚乱没有政治动机或者政治及社会背景。卡梅伦作为首相，想必应对导致该事件发生的政治、社会背景负责，他在宣称与此无关时有着明显的既定利益，媒体不仅赞同这一站不住脚的声明，还制造了一种对持不同看法的人怀有敌意的舆论氛围。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播放了采访资深黑人激进分子兼广播员达库斯·霍恩（Darcus Howe）的片段，他在其中称骚乱为“叛乱”，谈到了警察的种族主义和对年轻黑人的骚扰。采访者菲奥娜·阿姆斯特朗（Fiona Armstrong），知道这不是应该谈论的那一类言辞，立马转为抨击，并且说霍恩本人曾经是一个骚乱者。²后来，BBC为阿姆斯特朗的评论道歉，但关键是如果她犯了这对她来说是经过三令五申还明知故犯的错误，等于是丑化和边缘化了任何挑战共识的人。

这段视频再一次加强了本文的大体观点：

1 资料来源：<http://www.guardian.co.uk/media/gallery/2011/aug/09/uk-riotsfront-pages-in-pictures#/?picture=377707624&index=0>。

2 资料来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biJgILxGK0o>。

(亲资本主义)偏向也影响着如何引导访谈。被访者如果是一位“遵从”主流的政治家,与他/她是一些“极端分子”或者“异见者”的代表,即反资本主义者,采取的调子和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因为……

媒体人——功成名就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等,在各自岗位上深谙其道,练就了各尽所能去把脉、去觉察动态的本领,不是那么在意普通大众,当然不会体恤工人阶级,而是体察中产阶级尤其是权势集团。

就我看来,这些“媒体风暴”总是为“惩戒性的判决”铺路,对暴乱的反应证实了这是一种报复。无数得到发表的评论文章称赞“法庭已经对抢劫犯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严厉判决(《太阳报》)”¹;希望“警察把这些网络肇事者抓起来以煽动罪控告他们”²(理查德·小约翰);抱怨“英国左翼自由主义当权派的过分关切”³,并谴责任何企图进一步了解的尝试,就像托尼·帕森斯在《每日镜报》中写的:

试图理解骚乱者的感受就像试图理解一位将靴子压在你喉咙上的人一样……坦白说,亲爱的,我们中的很多人当下没有同情心。我们只是想看到骚乱者突然倒下在污浊里自作自受……骚乱为什么发生?因为我们和很多人渣生活在一起。⁴

也可以将此类新闻视作“盲目伤害”而不予理会,但是这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尝试揭开这类新闻报道的原因,并且揭露它为谁的利益服务。

在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我就像任何其他激进的媒体批评人士一样,特别受益于我应该在此致谢的两组先锋作品。第一,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Greg Philo et al)在一系列著作中,从1976年的《坏新闻》开始,已经提供了不列颠电视新闻报道的法庭剖析,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其对于统治我们社会的人的系统性偏见。第二,诺姆·乔姆斯基与爱德华·赫尔曼一起,在《制造认同》(Noam Chomsky with Edward S Herman, 1988)、《必要的假象》(Noam Chomsky with Edward S Herman, 1989)和无数文章中已经对美国媒体开展了同样的工作。即使我的结论与这些作者的有所不

1 资料来源: 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ews/sun_says/244723/The-Sun-Says.html。

2 资料来源: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23898/London-riots-Red-sky-night-Tottenhams-alight.html>。

3 资料来源: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2028417/DOUGLASCARSWELL-These-people-shoplifters-looters--looted-society.html#ixzz1VfCXhgIf>。

4 资料来源: <http://www.mirror.co.uk/news/top-stories/2011/08/13/uk-riotstony-parsons-the-britain-we-knew-has-gone-for-ever-115875-23340566/>。

同，尤其是涉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也不会降低他们的分析的分量。我也找到了两篇科林·斯巴克斯写的特别有用的文章，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98期，2003年春）的《媒体内部》和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14期，2007年春）的《电视真人秀：老大哥现象》。

最后，我想将此书献给保罗·福特当作迟来的纪念是合适的，他是我们时代一名杰出的前卫记者。

约翰·莫利纽克斯

2011年8月21日

前 言

我们所处的世界有许多赤裸裸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比如，358位全球顶级富豪拥有的个人财富和全世界一半的低收入人口拥有的所有财富一样多，约3,000,000,000人。或者，2010年一方面世界军备支出1660,000,000,000美元，几乎是有一半（696,000,000,000美元）由美国独占，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遭受赤贫和营养不良的人数高达1,000,000,000。换句话说，美国花在设计杀人的武器上的金钱摊到每个濒临饿死的人头上超过696美元，而这些武器的威力事实上足够消灭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好几次。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如下：

世界军费开支增加5.9%，刷新了2009年高达1.53万亿美元的记录……而军费开支的陡增发生在国际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之下。

自2000年以来，全球军费开支已经增长了49%……影响深远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看起来对全球军费开支却影响甚微。¹

同时，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美国、英国、法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是最为明显的例子——领养老金者、学生、失业者、公共部门的工人和很多普通人都接到了用来为支付银行系统救市的账单。

然而，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对这一事态显得多少有些安然若素。他们也许不开心但是甘心接受，这样的事态也因此能够继续下去，为什么呢？一部分的原因——尽管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那就是媒体所致。

以上引用的事实都有着广为流传的理由。不平等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没有激励人们就不会努力工作，因为财富是对勤劳工作或者聪明才智或者创业天赋的回报。除此之外，从这些富人为其他人提供工作这一点看，没有他们我们全都失业。至于巨额军

1 资料来源：<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php?i=466197>。

费开支，在每一个国家看来都情有可原，因为其他任何国家也同样为此耗费巨资，也就是被称为一种防御必要；确实那就是这些费用为什么被称为“国防支出”的原因。美国巨额支出的正当理由与众不同，因为美国号称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因此不得不双重防御，不仅要保卫自己还要保护所有的自由世界；事实上美国军队是自由事业的主要捍卫者等。

8 这些论调如此盛行以至于它们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成了事实和“常识”。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收媒体信息的狂轰滥炸。这些论调口口相传，当然——从父母、朋友、老师、演说家那听说，或在酒吧和俱乐部流传，等等——部分是因为人们从媒体过于频繁地接触到它们。相反，人们在反对不平等和军费开支的借口上也是有所共识的。比如军费开支主要不是为了捍卫自由，而是为了保卫有钱有势的人们，国内外的有钱人。但是一个被那种看法包围的人，只会意识到那听起来不同于第一种论调：代替那些听起来像常识的论调，这些观点有一点陌生、怪异，甚至也许是某种“阴谋论”。而且，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观点在媒体中显得颇为逊色，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又总是颇具争议。

在《1984》一书中，乔治·奥威尔描写了大洋洲从同欧洲作战转向同东亚作战的时刻：

温斯顿参加了伦敦中心广场的一次示威活动……在一个大红幕布的讲台上，一位党中央的演说家……向听众们慷慨陈词……他的声音，被扩音器放大后听起来有金属般的质感，震耳欲聋、嗡嗡作响，滔滔不绝地列着暴行、屠杀、流放、抢劫、强奸、虐囚、轰炸平民、宣传谎言、非法侵略、撕毁协议等罪状。听他演讲如果不是事先信服，随之狂热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演讲进行了约20分钟时有人匆忙上台送信，一张纸片被塞到了演讲者手里。他没有停顿就打开念。他的声音和态度，或他正在讲的内容，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名字突然变得不一样了。话音未落，人群里的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大洋洲与东亚作战！下一刻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广场上装饰的旗帜和海报全都是错的……会场一片躁动，海报从墙上被撕下来，旗帜被拉扯并践踏在脚下……但在两三分钟内就结束了。演说家，仍抓着麦克风，肩膀前耸，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继续他的演讲。一分钟之后，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除了攻击的对象改变之外，同仇敌忾的情形和刚才一模一样。¹

1 资料来源：http://orwell.ru/library/novels/1984/english/en_p_2。

而且，从那一刻起，人们就宣扬和深信大洋洲已经与东亚为敌，而与欧洲已经成为盟友。

只要夸张那么一点点，有时候看起来我们的社会正是如出一辙。大概45年的时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柏林墙倒塌，“西方”（美国和它的盟友）的敌人是共产主义（苏联和它的盟友，还有那些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西方借着与其竞争的名义，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制造最强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并且还制定了对苏联的城市使用这些武器作战的计划，全然不顾此举必定会导致数千万平民的丧生；打响几次主要的热战（大约300万人伤亡的朝鲜战争和同样伤亡惨重的越战）；侵略了不少国家（古巴、危地马拉、格林纳达等）；在其他一些地方挑起代理人战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支持一系列统治政权（尼加拉瓜的苏慕萨、智利的皮诺切特、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南非的种族隔离等）和无数伊斯兰军事武装，如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对抗苏联入侵）。

接着，多少因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西方的敌人变成了“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与之前的行径如出一辙，西方借着同这个敌人斗争的名义发动了两场主要的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和无数的代理人战争（特别是在非洲之角）；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支持各种统治政权（如：再次是沙特，还有埃及的穆巴拉克）；建立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的集中营，大肆引渡逃犯，施用水刑。

10

如果这个对比是合理的，在某些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就是：（a）谁向演讲者传达命令/谁控制了CNN和福克斯新闻？（b）为什么人们盲从相信/或者他们被告知的是什么？这本书将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无论今天的西方社会和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思想有多么相似，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别。比如，我们社会的媒体不是简单地甚至不是主要地任由政府控制宣传。它的很多部门经常性地攻击和批判今天的政府，甚至是那些国有媒体也频繁播放不同政见。事实上，大部分群体也不总是那样盲目地受到媒体的支配。最明显地，顶着主战媒体的巨大舆论压力，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游行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当然，这些群体抗议并没有成功阻止战争发生，但那是因为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掌握着政治和军事权力去发动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说服了每一个人相信这场战争是合理正当的。通常还有情况更复杂、从某种程度来说更困难的一些事件也必须加以讨论：媒体偏向可以到达什么程度而偏向的明确本质又是什么；为什么人们挑选他们的媒体；媒体在控制和影响人们的言行上到底有多大效力？

11

除了指出这些问题，我也想从一开始就说一下我的偏向。媒体的很多部门，比如BBC，宣称政治中立。由于种种原因，我将声明我不接受这样的宣称；甚至我将证明

那是彻头彻尾的误导。我不是因此企图自欺欺人。这本书并非政治中立。它有着明确的、要改变世界的写作立场，除了想要转向社会主义之外，我指的是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的并且是根据人们的需求生产而不是利润生产的社会。出于这个原因，我也将回答如何与媒体目前的持续影响作斗争并最终改变它。

这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写作的，一如既往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是了解媒体的关键。

媒体偏见

作为一名长期的活动家，我经常被采访或者在媒体上露脸，大多数与游行和运动有关。时不时地，我会向记者提到媒体偏向的问题。几乎是千篇一律地，他们彻底否定这样的指责，坚持他们只是报道事实和代表所有的观点。我从来都不是很清楚他们是否被训练好了来说这一套，更有可能像呼叫中心里的工人有一个手册一样，里面列有他们不能偏离的守则，或者他们真的相信这一套。很简单，如果你收看诸如BBC的政治谈话节目《提问时间》，你可能会注意到，若嘉宾席上或者观众中任何一个人质疑节目的政治中立，主持人大卫·丁布尔比或者无论谁，马上跳起来维护他们的雇主——放弃任何他们伪装起来的中立——去坚持节目的绝对公平和毫无偏见。 12

然而，事实上，不管怎么否认，媒体都深陷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之中。这一点不只适用于某些媒体——《每日邮报》但不是《独立报》，报纸但不是电视，美英国家但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所有媒体。我想讨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点，确定无疑。我对此不是在抱怨，事实就是如此。

这里面的理由非常简单。制作不带偏向的布告栏、报纸、杂志、电台节目等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或多或少都会发生数不尽的事情，它们不可能都被报道——事实上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事情能被报道。相反，包含关于重要性、“新闻价值”、趣味性等判断的严格挑选过程是不存在的，那些判断天然地带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甚至这样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作判断的人（编辑、制片、记者）越不认同这一点，越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明显”和“中立”的，他们的偏见就越多。 13

让我举几个例子。英国每年大约有235,000对新人结婚——那就是大概每天644

对。这些婚礼的大多数根本不会被媒体报道。然而，2011年4月29日威廉·温莎和凯特·米德尔顿结婚，婚礼举行前、进行中、结束后一定会被媒体大幅报道。这当然是因为威廉·温莎是查尔斯·温莎的儿子，而后者又是女王伊丽莎白·温莎的儿子，所以这是“皇室婚礼”。皇室婚礼与普通婚礼在报道上的悬殊，反映了同时也加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几乎为所有媒体、政府、主要的反对党（目前是工党）和大多数英国的统治集团所共持，即皇室的任何事情和每一件事情或多或少地比我们其他人的同样事情更重要和更有趣。换句话说，它反映了媒体连同国家和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信守之道。这就是政治偏见。

14 另一个例子是：就在我写作的这一刻，巴西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洪灾。这是巴西数十年来最惨痛的自然灾害，已经超过500人死亡。在BBC新闻网站的主页（对应世界新闻）上这条新闻是第三则，排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未成年舞者的绯闻下面，仅仅在教皇计划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举行宣福礼的新闻上面。《卫报》网站有更多的报道，《太阳报》《每日镜报》《每日邮报》几乎只字未提。这没什么值得惊讶——它又一次反映了这些不同媒体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倾向。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英国就明显会得到大量报道，而如果发生在美国则会比发生在巴西得到的报道要多得多。这是因为大多数英国媒体已经普遍默认，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发生在世界上除了英国本土之外任何别的地方都更重要和更有趣。

这两个例子所表明的是，甚至在我们讨论故事是如何被报道之前，媒体就把偏见放进了所报道的内容里，这是难以避免的。面对立场偏向的指责，一种媒体代表们和辩护者们屡屡提到的观点出现了。他们说我们因左倾而被右翼攻击，又因右倾而被左翼攻击，因此表明我们几乎处于不偏不倚的中心。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发生，我稍后将对此进行详谈，但是结论绝不能照搬。首先，有必要搞明白，所谓中心，被称为马路中间，本身是一个方位——一种偏向——因此这个观点与其说是否认偏向还不如说是证明偏向。其次，认为真相会处在那些主要反对意见中间的某个地方，这样的看法依据不足。比如，哥白尼和伽利略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而天主教坚持太阳围绕地球运行。真相并没有处在两者的中间。纳粹集中营里数千幸存者证明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惨遭灭绝；大屠杀否认者，如大卫·欧文，宣称这是骗局。双方都自说自话，
15 莫衷一是。医学证据表明抽烟是导致癌症的致命原因，烟草公司千方百计否认。他们不是正误对半，是在撒谎。而且烟草公司玩世不恭地利用“平衡”的媒体概念，包括采用骑墙态度来隐瞒抽烟的真相，这与石油公司和别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通过资助气

候怀疑主义的伎俩如出一辙。¹

既然媒体有所偏向是无法自拔的事情，关键问题就是，偏向的本质是什么和它是怎样运作的？

1 资料来源：Suzanne Jeffery. Why We Should be Sceptical of Climate Sceptics [J].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29, 2011 (winter)。

媒体偏见的实质

媒体不能一概而论。国内外有众多不同的报纸、电视台、杂志、电台、个人节目、电影公司、影音公司等，每一家媒体对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看法。在英国，《每日电信》正如它一贯表现的那样与保守党紧密配合。《太阳报》在撒切尔夫人时期倾向保守党，在布莱尔时期倾向工党，而现在又一次倾向保守党（一切都在老板鲁珀特·默多克的操纵之下），《每日镜报》传统上倾向工党（但属于工党右翼），而《卫报》则居中偏左并带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属于右翼和共和党（也是由默多克把持），《好莱坞日报》通常倾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党。在意大利，大量的媒体，包括三家国家电视频道和国家最大的出版社，由首相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所拥有并支持他的政见。在法国的日报中，《费加罗报》右倾，《世界报》微左。

16 很明显这样的清单或多或少可以永远列下去，但我想简要突出的重点，这也不属于我的论证，有一些秘密阴谋或者隐匿权力控制所有的媒体和保证媒体遵循一些政党路线或者特定章程。

科林·斯巴克斯已经在《国际社会主义》（第98期，2003年春）上发表的《媒体内部》一文中提供了一份非常复杂和细致的说明，解释为什么存在这些区别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¹然而，我想强调，有一种特别的偏见，即使不是99%的媒体，也有95%，在英国和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点：倾向资本主义。这太普遍了，太顺其“自然”了，以至于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我的意思是，绝大多数的媒体简单地假定普通资本主义商业活动是正当合法的、的确也是令人期待的事情，他们对此丝毫不觉得有任何加以专门讨论的必要。它假定，一般来说如果商业发展顺利，即创造高额利润和扩大生产，那就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它假定，商业人士在各种各样的话题上都是正当合法的代言人，而教育除了特别事项外应该迎合商业的需要（它通常称为“经济”）。它假定，如果出口提高，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而不只是对从中获利的公司而已；如果公司开了工厂或者呼叫中心，那就是“创造”或“提供”了工

1 资料来源：<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8/sparks.htm>。

作；如果股市上涨，对我们大家而言就是好消息，如果下跌则是坏消息。

为了说明这点，看看下面这段摘录，它来自BBC新闻网站2011年6月7日的一篇文章，尼克·罗斯写的《中国超级富豪的世界》。¹

谁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领导者？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一百年前，是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他们在创造未来。

随着中国逐步逼近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下一个世纪属于谁。

我们最好习惯这一点。

当我读到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时，如它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以及新富中产阶级的消费狂欢，我想找到正在引领这些转型的人们……

我从政府或政党的领袖方面进行探讨，他们正引领着社会发展。

我在寻找国家爆发式经济增长背后的人们——顶级企业家。

是他们建立全球的公司，引导中国的出口所向披靡并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

三十年前，企业家被形容为“个体户和小商贩，那些行骗、贪污、贿赂和逃税的人”。

接着路线改变了。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

马克思对企业家的看法有怜悯之心。在《资本论》中，他断言工人被资本家剥削，资本家从工人劳动的附加值中赚取利润。

但他辩称说，企业家，尽管仍然是资本家，但通过他们的新创意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来增加他们自己的价值。

企业家，至少那些好的企业家，是良心资本家，马克思说。那就解释了如今中国的重新复兴。

我想在企业公告和精心维护的公众形象背后了解中国超级富豪的真实生活，听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尝试了解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他们13亿的同胞跃升到社会顶层。

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他们如何处理财富？

他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当他们公开谈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致富之道、他们对自己下一代的希望和对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预期时，我感觉我只是开始穿透神秘的面具。

除了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成为迷人的角色，他们允许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

17

18

¹ 资料来源：<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3346599>。

一睹新中国风采，了解那将塑造我们未来数十年生活的力量。

关于这篇文章需要说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不留神它就被全盘通过了，我确定它应该是被作者和BBC都认定为政治上无争议和“无偏见”。我选择它不是因为它有多么不寻常，而恰恰是因为它再普通不过了。其实，它对这些“超级富豪”们极尽阿谀奉承之吹捧能事（因为篇幅的原因，我删掉了一些“他们垂涎三尺的5万美元的手表”等用语），文章包含关于对中国人的描写，和关于马克思的言论——马克思既没有“对企业家的怜悯之心”，又没有在《资本论》中辩解他们“通过新鲜创意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来增加他们自己的价值”（显然罗斯没有读过《资本论》）。¹但这些是小问题。19 其主要的问题是，整篇文章绝对理所当然地以资本主义的基本假定为前提，这个假定就是企业家们，尤其是大企业家们，是财富的首要创造者、震撼世界经济的建设者，是塑造未来和“我们的所有生活”的人。

同样地，西方媒体几乎完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我不是指布莱尔或者埃德·米利班德的“社会主义”，他们在现实中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延续并且对现有体制根本没有威胁，我指的是站在代表消灭资本主义和代表社会所有制并对生产进行控制的社会主义。既然媒体假定资本主义是自然法则，它也就假定了社会主义是离经叛道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很少见诸于媒体，当他们露脸时通常被主持人描述为怪异的还可能是可恶的。讨论社会主义理想的文章或者段落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它们偶尔出现也通常是被搁在边边角角的位置（晚上11点30分，内版尾部的零落专栏里）。媒体是“温和”的，就像我们注意到的一样；它站在道路的中间，但那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者们被看作极端分子和肇事者，有几分类似拦路抢劫的强盗或者路边敲诈的恶棍。

对比下面就同一事件报道的两个（虚构的）版本，想象一下在六点钟新闻主播的嘴里是怎么播报的：

德国汽车制造工厂——大众汽车，今天宣布计划在米德尔斯堡地区建设将有2,000个新工作岗位的新厂。当地社区领袖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将给受经济衰退困扰的地区提供投资和就业机会，解了燃眉之急。

德国汽车制造工厂，大众汽车，今天宣布计划在米德尔斯堡地区建设新

1 事实上，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明确地宣言，所有的价值源自劳动而不是企业家的聪明才智。这是小事情，但是我已经注意到，多年来，在大多数媒体，人们完全接受这个说法去杜撰引言或者观点，而随意归责于马克思（列宁或者托洛茨基）。这样做的时候，检验事情的真实性几乎毫无依据或者毫不费神。

厂。他们希望剥削2,000名工人。显然他们被这个地区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产生高额利润的机会所吸引。工会领袖敦促所有工厂的新雇员们组建一个工会，认为该公司因残酷无情的劳资关系而臭名昭著。

第一个版本，倾向资本主义的观点，听起来完全“正常”和司空见惯，至关重要。它听起来是中立的；其实它将大众汽车包装成了社会慈善之辈。第二个版本，同一事件的社会主义观点，听起来真的古怪荒诞——它不可能被BBC或者ITV播出——而它听起来有失偏颇，尽管（在我看来，当然）它比第一个版本更接近真相。

媒体偏见的根源

这种倾向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偏颇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媒体，英国的和全球的，都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创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像沃特·迪士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和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公司这样的大巨头，自然支持资本主义和商业。你可以反驳说，写报道和制作电视广播节目的记者、编辑、制片人不是资本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媒体公司是等级森严的，不是民主的，为他们效劳的记者们知道如果他们想保住饭碗或者谋求晋升就要将某些潜规则谨记在心。¹假想你是《太阳报》的记者：你了解你提交的每一个故事会到达助理编辑手上，他们会检查和改编它，你也了解助理编辑为编辑打工，了解编辑需要的风格和政治路线，而编辑知道老板默多克的路线要求。任何人想在公司混迹生存或者飞黄腾达，不仅必须接受审查而且很快就学会了自我审查。

显然也有例外。很多国家有国有电视台，目前最突出的就是BBC，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重要角色。BBC是政府也就是国家通过收取许可使用费筹措资助的公司，它不靠为股东们赚取利润来经营，而是靠维持明确规定的政治中立的角色来管理。它在国内外的地位与它运营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声誉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是意味着，它不像一些国有电视台，不是简单的英国政府的喉舌，而政治中立意味着它本来采取的也就是大致介于保守党和工党前座议员之间的居中立场而已。所有关于亲资本主义偏向的争论非常适用于BBC，就像它们适用于其他媒体一样。

这是因为政府是国家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状机构，它对社会行使终极法律权力，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专政。国家机构的中心是军队、警察、司法、监狱和行政部门掌管的上层机构（那些执掌政府部门的人等，而不是在救济金办公室或者职业中心上班的人）。

1 想了解关于这些等级的细节和复杂性的更全面分析，请参考科林·斯巴克斯，《媒体内部》（Colin Sparks, *Inside the Media*）。

在英国，国家的领导人名义上是女王——在大多数国家这几乎就是礼仪性的总统——但真正操纵国家大权的人物通常不这样公开亮明身份。

几乎每个现代国家都宣称自己代表“全体”民族国家。它通常通过媒体和教育系统将自己描述为独立于任何既得利益集团并服务于全体人民，同时一致地宣称自己是最高政治当局且“非政治”！军队为“国家”而战，警察“服务于公众”，法官是“独立”的，行政部门为“当选的政府”效劳。 22

这种国家中立的概念是英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论调的核心，然而这不过是神话而已。很久以前，马克思就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补充道，“现代国家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国家资本的理想人格化”（*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1880）。无数理论和经验研究——最显著的是拉尔夫·米利班德（埃德·米利班德的父亲）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表明：一百六十多年来的经历已经一再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正确论断。无论什么时候普通百姓试图抵抗资本家老板的力量或者挑战资本主义体系，从19世纪早期宪章派到1871年巴黎公社，从1926年的大罢工到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到2010年希腊和法国工人还有爱尔兰和英国学生的抗议，国家都动用警察、军队和法庭出面维护这个体系和富人的财富。手段经常是极其残忍的，包括谋杀和拷打。此外，国家驱使工厂在资本家的管理下与别的公司竞争而获得利润最大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煤炭委员会或者私有化之前的英国铁路公司，就像资本主义工厂一样运行。

这样看来，BBC是国有广播公司的事实并不能消除它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这样的事实倒不如说确证了这种倾向。BBC由它的总裁控制，也是它的总编辑。目前¹的总裁是马克·汤普森，毕业于斯通尼赫斯特学院、牛津大学莫顿学院，他是英国收入最高的公职人员，每年收入在80万到90万英镑之间。除此之外，他已经通过支持在《提问时间》节目中邀请英国国家党党魁尼克·格里芬现身，而拒绝播出加沙灾难紧急委员会呼吁人道主义援助，来表明他的“中立”。总裁由BBC信托人理事会（直到2007年管理委员会）任命，实则由女王在政府部门的建议下任命。被任命为总裁的人显然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有着可靠的履历，即倾向资本主义——积极的反对资本主义者或者激进分子从不会被任命——但即使如此，信托人理事会总是在那干预，防止总裁变得“特立独行”或者“越线”，这可是意味着与权力集团的利益即资 23

1 这里的“目前”指作者约翰·莫利纽克斯撰写本书期间，马克·汤普森于2004—2012年任BBC总裁。——译者注

本主义的利益严重抵触。

这种操纵非常清楚地表现在2004年因吉利根/凯利事件导致总裁格里戈·代克被罢免的过程。这关系到布莱尔政府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的声明（被证明是假的），声明中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BBC记者安德鲁·吉利根炮制了一份报告，声称情报显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这样的武器的政府档案曾经被政府“篡改”（特别是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他的消息来源是大卫·凯利博士，一位资深的联合国武器巡视员。当吉利根受到坎贝尔和政府的攻击时，格里戈·代克为他辩护。接着，凯利在紧张的政治、媒体和特务机关的压力之中自杀身亡。布莱尔任命哈顿勋爵领导对这一事件公开调查，而当哈顿调查以一种公然倾向政府的粉饰形式谴责吉利根和BBC时，BBC董事们撤回了他们对总裁的支持，代克被迫辞职，吉利根被解雇。

24 关键是，该事件不只是关系到布莱尔政府，还关系到英国和英国整个统治阶级：它不可能公开承认，国家因为一个精心策划的谎言而参与战争，尽管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在这样的氛围里，一位总裁和一名记者没有抓住他们的“责任”所在就可能轻易被免职。而且，整件事情可能通过组织结构精心策划，且组织结构的每一部分都声称是“独立的”、“公正的”、服务“公共利益”的。

这并不意味着BBC像《每日邮报》那样有着明显的党派偏向。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知道有两个因素可有效地抵制公开的右翼偏见：（1）它的国内外信誉取决于能否维持一定的中立形象；（2）它的很多最佳记者、调查员、制片人可能有个人进步观念，而且他们需要给予一定的退路来留在这个行业。这些兼顾各方的行动显示，BBC不是像福克斯新闻那样的不加掩饰的右翼宣传机构，也不是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电视台那样的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机构；在一种公正的表象后面，它相当于温和的亲资本主义者、拥护当权集团的宣传机构。

偏见的影响

在英国，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人数不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论争也不是政治话语的中心议题，但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媒体亲资本主义倾向的观念输出微乎其微。相反它绝对是塑造整体风格和内容的中心。

首先，这种偏见完全决定了所有新闻和实时报道的构成状况。如此一来，普通百姓之上那些顶级政客的言行得到了大量的优先关注。除了一些特殊领域例外——犯罪、“名人”和体育娱乐——人物的新闻价值或多或少地与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中的地位相关。有关犯罪的报道例外，因为媒体总是小心翼翼地报道涉及权贵的罪行，特别是考虑到他们起诉的能力，但是对待平民的罪行却幸灾乐祸，大书特书骇人听闻的报道，仿佛这样既能使他们描述处于不利环境的平民，以此去加固人性本恶的资本主义观念，又能为呼吁“法律与秩序”和更多的刑罚煽风点火，以此来增强国家的镇压权力。名流运动明星是例外，因为他们的关键作用之一是说服我们相信“平民”能跻身上层，虽然绝大多数名人都没有够到真正的社会顶层。英国时下的百人富豪榜单全部由资本家占据，没有一名娱乐界名流或者体育明星。

亲资本主义的偏见影响着整个故事选择的过程，这在本章开篇就讨论到了。它决定着报道中的用语，媒体称之为“劳资关系”，而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罢工”或者“工会斗争”。这样无论在哪里报道可能的争议和罢工，媒体都会根据它们对公众的“影响”（来确定报道方向）：如果铁路工人罢工，媒体会采访因回不了家而牢骚满腹的上班族；如果是空勤或空中交通指挥员罢工，他们会寻找计划泡汤的度假者；而争端总是会搁在工人身上。相反，争端的真正根源，即工人的冤情，如果他们能逃得过惩罚的话，报道完全会忽略不计以至于造成某种印象，那就是罢工行动只是任性的意气用事。如果事件必须被报道，管理部门会被说成“提议”或者“恳求”别人（特别是工人）取消他们的“破坏”行动；而工会则被描述为“拒绝谈判提议”或者提出各类“要求”。工会经常性地被形容为“权力过大”和“要挟国家”。雇主几乎从来不会受到同样的批评，尽管事实上他们显然比起工会来权力更大而且更富有，屡屡还动则以威胁关闭工厂和搬迁离开来要挟政府和工人。当谈到劳资纠纷，甚至是极端左翼

25

26

的商业媒体如《卫报》和《每日镜报》也通常对罢工者和“激进”的工会分子怀有敌意。大量的可以支撑这些论断的有力证据，于20世纪70年代被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收集（当时劳资关系一贯是国内新闻的中心议题），还呈现在三个系列的先锋研究中：《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 Ron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6）、《更多的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 Ron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0）和《糟糕透顶的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 Writers and Readers Co-operative, 1982）。

左翼抗议示威的遭遇也差不多，媒体在这玩了一个等同于“第22条军规”的巧妙花招。如果示威进展顺利，即使规模很大，媒体也常常矢口不提。我曾亲身参加过有10万人或者规模更大的反种族和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新闻界却完全不予报道。然而，如果发生一些冲撞或者“擦枪走火”，媒体会铺天盖地大肆渲染，但是只会完全专注于对示威者口诛笔伐。同时，他们会强调“激进分子”要对已经造成损坏后果的暴力事件负责，而对他们示威的原因却顾左右而言他——媒体对此要不然就是置之不理。

27

我第一次参加的示威游行，是1968年3月27日的反越战游行示威，事件最后在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前发生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激战告终。报纸对游行示威者的暴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且不说他们从没有考虑过警察（他们出动马匹驱散人群）也可能难逃其责的事实，人们会以为对与骑马的警察对峙、战斗的一些学生的“暴力”如此心惊胆战的编辑们，会对美国在越南村庄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和凝固汽油爆炸的“暴力”有疑问。然而他们显然不会。从那时起，媒体对多起示威游行掀起类似的风暴已经日渐疲惫，包括1977年在刘易舍姆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反法西斯者与国民阵线分裂的游行，1984年在欧格里夫发生的矿工群体武装纠察，1990年的人头税暴乱，1993年反纳粹联盟尝试行进到英国国家党威林总部时与警察对抗，还有，最近的2010年11月、12月学生示威。此外，这些风暴无一例外地得出锁定和起诉示威者个人的结论，同时也为“惩戒性”判决埋下伏笔。

亲资本主义的偏见塑造着每一个辩论节目的嘉宾组。在这方面最令人瞩目的节目《提问时间》，其嘉宾组经常是这样构成的：一名保守党党员，一名新工党党员，一名自由民主党党员，一名商业人士（经常也是保守党人），以及一名其他人士。这里面的前四位几乎总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非常罕见的工党左翼人士是例外），而那位其他人士经常只是来自娱乐圈的无党派自由主义者。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严肃的左翼才会出现在第五个位置上。因此通常是有两位保守党，总是资本主义占大多数，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远多于社会主义者，大概10或者20比1。

28

这种偏见也影响了访谈如何被引导。如果访谈者是“受尊重的”主流政治家，与

访谈对象是“极端分子”或者“反对人士”的代表——也就是反资本主义者相比，当然，对之采用的口吻和态度往往大相径庭。一旦访谈开始出现咄咄逼人的语调，就是向观众示意：这是一位“坏”人。时不时地，英国当局认定一些人为严重的政治威胁分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于媒体而言，这个人就是可以随意被攻击的——或多或少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似乎是工党正式左转的时机）的托尼·本和肯·利文斯，通矿工大罢工时的阿瑟·斯卡吉尔，伊拉克战争时的乔治·加洛韦（程度轻微），都遭受到类似的媒体妖魔化。对于年轻读者来说，这可能很陌生，因为现在他不再是威胁，托尼·本被作为友善大叔和国宝级名人对待，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被描绘成危险的极端分子。¹

有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些观察并没有隐含阴谋论。媒体人——成功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等各司其职，通过他们的能力去把脉、感知环境，与其说是揣摩公众，但绝不会是工人阶级，不如说是讨好中产阶级而且首先是当权派。他们与实力强大的政客和商人保持专业和社交来往，在介绍会、午餐、聚会等场合，就像国际新闻集团的丽贝卡·布鲁克斯和卡梅伦都在“奇平诺顿组织”中一样。他们靠的是在行的暗示和透露内部消息，而且知道他们的上级需要什么。像特雷弗·麦克唐纳、费奥娜·布鲁丝、安娜·福特和柯斯蒂·华克这样的人，也知道什么时候得听起来高兴、什么时候得听起来低落，他们甚至于挑一下眉毛都会被注意到。

29

最重要的是，亲资本主义的偏见绝不限于新闻和时事，它弥漫于整个媒体。想一想，比如像《学徒》这样的节目通过高呼“企业家精神”而充斥着明显的利商宣传。显然，不会有像《如何成为工会代表》或者《本年度杰出年轻工人代表》这样的节目。那将会是滑稽可笑的！但这只是隔靴搔痒而已——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社会思潮渗透到了甚至是媒体中公然标榜最不关心政治和反政治的部分，比如轻娱乐和广告。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领域。

1 关于媒体对托尼·本妖魔化的详细描述，参考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糟糕透顶的坏新闻》，第67至112页。

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30 媒体行业大量提供的不是新闻报道或者教育产品，而是生产“娱乐化”节目。它的目的是让人们沉迷享受，还指望人们不是因为迫不得已去消费，而是乐意而为之。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从整个音乐产业，包括主要或者全部播出音乐的电台，到出自好莱坞、迪士尼或者宝莱坞的电影，再到小说作品、儿童漫画、色情文学、大量的电视节目和相当一部分的报纸（尤其是所谓的小报和通俗报刊），无不充斥着这一逻辑。

明显例外的是，比如约翰·伯杰从1992年开始写作的《观看之道》系列书籍，或者肯·洛奇从1966年开始的话剧《凯茜回家》，这些娱乐内容引人发笑，但不能激发起太多的理性思考和情感需求，也不会导致过多的伤感。假定既然大多数人家家里家外地忙了一天，一般都会感到身心疲惫，他们想从媒体中得到的是“轻松”，也就是能提供简单的刺激（如普通的动作片）或者舒缓放松（如访谈节目或者家庭情景喜剧）的视听或者阅读内容。

31 既然政治话题是相当不受待见和普遍令人生厌的——充满了争议、冲突和难题——这整个“娱乐”领域就表现得非政治化。实际上，这是欲盖弥彰。当然它不聚焦当天的议会或者谁去为了下一次竞选投票，这些事情通常被定义为政治活动，但是它所做的，绝大多数地表现了从那些掌控和支持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世界观。媒体又一次暗度陈仓，把它混合到人们确实感到轻松愉悦的成分中，只会让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更强大。

拿《太阳报》第三版的特写为例。这个栏目主要提供给它的男性读者们少许窥视快感——司空见惯的迷人裸胸少妇的意象。这一点被《太阳报》称为“只是少许情趣”而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指责为假正经和煞风景。工党首相克莱尔·肖特，在1986年曾发起反对第三版的运动，结果被报纸特意贴上“煞风景的克莱尔”的标签。事实

上,《太阳报》心知肚明而它的读者也心照不宣,关键的是它反映了妇女的社会角色和性别的整体观念。它将妇女贬低为只有身体的存在,剥离她们的智力、个性和真情实感(图像搭配的题注是其中一部分),还将她们当成主要是为了取悦男性的存在。尤其是它鼓励一种特殊的、既有的、男性在餐厅或酒吧等场所谈论妇女的方式。同时它给妇女加压去试图实现难以达到的人工化“完美”的标准。

另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是电影《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1997年上映,詹姆士·卡梅隆改编和执导)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而我选择它是因为本书的读者看过电影的可能性很大。《泰坦尼克号》给观众提供了一连串的卖点:重构了一段著名的历史情节;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艺术特效的最新技术;窥见统治阶级的高雅和奢侈;跨越阶级的浪漫爱情故事。最后这一点是经久不衰、一再出现的文学主题:从“灰姑娘”那样的童话故事,到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再到D. H.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部分原因是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太少见了(在流行文化中提供的愉悦通常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被剥夺的——想一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弗雷德·阿斯泰尔的音乐剧,或者詹姆士·邦德的电影)。然而嵌入这些成分里的正是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观。

32

美利坚合众国于1776年在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革命中诞生,总是将自己展示为被压迫者的自由和机会的乐土。“那些疲乏的、贫困的、蜷缩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来我这吧”,自由女神在19世纪对贵族欧洲说。19世纪美国还有奴隶制或种族主义,这还有点说得过去,但是当美国由庞大的非正式经济帝国变成了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力量时,这套说辞在整个20世纪的冷战,甚至“反恐战争”中依然维持不变。移民不再受到同样的欢迎,但是标榜“自由”的宣言一直存在。美国在这一神话宣传上受益于没有封建制度历史,因此没有君主制、没有世袭贵族、没有元老院。这样一来,尽管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美国还能够维持自身“无阶级”的形象。

《泰坦尼克号》系统地认可了这种美国的观点。这艘船从南安普顿发出,驶向纽约——一种文学手法象征着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旅程。在船上,露丝·德威特·巴克特(凯特·温斯莱特饰演),一位上层阶级的年轻女子,与一位更加上层阶级的卡尔·霍克利订婚。这本质上将是一桩家庭包办婚姻,目的是为了解决巴克特一家的债务问题。露丝绝望低落而想逃离。她一度想跳船但是被另一位乘客救了起来,他叫杰克·道森(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是一位来自二等舱的流浪艺术家,接下来他们坠入爱河。霍克利被刻画为冷酷无情、傲慢自大、复仇心切的人,他对此大为恼火。他派男仆诬陷杰克并把他拷在船舱,然后想开枪杀了他,但是没有成功。露丝和杰克逃离了霍克利的魔爪,但当船沉没的时候没能登上救生船。他们最后掉进大海,杰克被冻死而露丝被救后像普通人那样到达美国过上新的“自由”生活(她改名

33

露丝·道森)。

从陈旧不变的、保守顽固的、冷酷无情的、贵族特权的社会逃往自由、平等的现代美国，这样的故事梗概在一系列从属的场景和情节设计中被强化了：上层甲板冷酷僵化的气氛与下层甲板轻松、活泼、灵动的舞蹈（露丝加入的）形成鲜明对比；在船长舱杰克遭遇了明显的势利对待，这种情形被象征着美国新贵的莫利·布朗逆转；邪恶的斯派瑟·拉夫乔伊（卡尔的仆人）由一位非常英国味的演员大卫·华纳扮演；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对待乘客不加掩饰的阶级偏见。

换句话说，凭借努力获得11项奥斯卡奖的《泰坦尼克号》，向美国人自己和全世界表明的正是它的经济和政治统治集团愿意选择的美国风格。很明显，这种分析将在无数大众媒体的文化产品中重复。然而，应该注意，正如我在第一章开始时所说的，这些内容在政治上不是同质的。在好莱坞和美国文化产业中出现的一些人无疑是右翼分子，他们在文化倾向上同于乔治·布什和共和党——举“兰博”电影为例——但是一般来说，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和巴拉克·奥巴马、保罗·纽曼还有泰德·肯尼迪是自由主义者而言，好莱坞是温和自由派；偶尔它是更激进的自由派，比如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或者乔恩·斯图尔特主持的电视节目《每日秀》。只有迈克尔·摩尔（出现在《科伦拜恩的保龄》《华氏9/11》《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真真正正的左翼，但即使摩尔也在《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结尾中说，“有一种可以选择的资本主义，它叫……民主”——这也不是社会主义。

34

但考虑到详尽地分析大量的相关内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做的，是朝着一种普遍情况而努力，通过仔细审查两种大众传媒类型即娱乐节目和肥皂剧，每一种类型都在当代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后检验广告的效果，也就是贯穿、支撑和影响大部分当代媒体的广告。

游戏节目

自从开创以来，各种各样的游戏节目已经成为电台和电视台的一部分，同时随着这些媒体的蓬勃发展而行情高涨。维基百科的英国娱乐节目列表显示¹已经达到146档，根据不同风格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它包括31档智力竞赛节目、6档相亲节目和13档称为“真人秀”的节目。很明显，这些节目表现出并且通常被看作完全“非政治化”，除了当它们由于一些丑闻加身而变得富有“政治”意味时。例如，杰德·古蒂和希尔帕·谢蒂2007年在节目《名人老大哥》中闹出的种族歧视丑闻，导致了下议院提起议案以及印度发生示威运动；或者当某一位政客到场时，就像倒霉的乔治·盖洛威2006年在节目《名人老大哥》中现身那样。游戏节目同样明显地显示了：(a) 资本主义企业本质上通过广告、商业赞助和向电视台卖节目来盈利——恩德莫公司，《老大哥》和同样成功的节目《一掷千金》的制造商，被西班牙电信公司在2000年以55亿欧元收购（尽管后来在它的运势下滑之后不得不被亏本出售）；(b) 它完全被资本主义精神和价值观所垄断。

35

游戏节目的制胜之道在于参加者是争先恐后去获奖的人们。他们竞争的游戏从多少纯粹靠运气的系列（《正确出牌》或者《一掷千金》）到一些知识测验的益智系列（《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再到更为肉搏上阵的系列（《角斗士》和《大挑战》）；奖金从生活消费品（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更普遍）到现金，再到就业机会（尤其是才华展示的节目，如《英国偶像》）不等。通常参赛选手是不具备专业知识或技能的“普通”人。其中的创意就是让观众，也就是其他“普通”人，感同身受地与参赛者共同经历并陶醉于想象他们将要赢得汽车、免费假期或者金钱。有趣的是，在益智节目《足智多谋》中，这档“才高八斗”而行情走俏的游戏节目，多少是精准锁定了中产阶级的观众，却没有金钱奖励；身份或者名誉上的精神回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大学挑战》节目中。

当然所有这些竞赛都被认为仅仅是人性使然。既然不论是否在人性中存在些许竞

1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UK_game_shows。

争本性是一个复杂的辩论，我不打算在此论述，但是游戏节目高度聚焦于竞争，就是作为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反映。资本主义受商业竞争驱动而不是受生产者之间的合作驱动——即使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资本主义逻辑，在教育领域或其他工作领域，相对来说其重心大部分放在了竞争而非合作上。这样一来，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的评价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而合作通常被斥为“欺骗”。

36 在一些游戏节目中显示出的资本主义消费刺激是明目张胆和无所顾忌的。观众在颁奖的时候被安排发出“哦”和“啊”的声音，或者甚至当某人胜出时发出模拟狂喜的欢呼和尖叫。更有甚者，为了在电视上露脸参加者被要求自我愚弄甚至甘于被羞辱或丢面子，这加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是“王道”，所有的一切在它面前必须卑躬屈膝。

近些年来，最具文化意味的游戏节目是《老大哥》。《老大哥》在现成的游戏节目类型中增加了一些亮点。首先，它以“真人秀”为噱头打响牌子。其次，参加者们不是依靠技能，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技能，而是依靠在公众中的“人气”来竞争。最后，作为“名人”奖励不是那么丰厚。这里的每一个亮点都需要被审视一番。

宣称给“真实”下定义或者代表“真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言。这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媒体话语的层次上来说说是千真万确的。你是否频繁地听到一位电视主持人、记者或者谈话节目中的嘉宾说“在现实世界”或者“像某人一样在现实世界工作”？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指的是商业世界或资本主义商业，而不是学术世界或政治世界（议会政治）。而且他们所指的是从资本家的视角出发的商业世界，而不是从工人的视角。至于“真人秀电视”，噱头就是我们将观看“普通人”真实过日子的场景，与戏剧和情景喜剧中看到的演员或表演截然不同。

37 这种声明完全是误导。《老大哥》节目的参加者被置于百万人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是在他们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角逐：他们因此从第一天就开始表演而远非展示“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完全人造的并且是被节目制作组高度监控的。电视节目制作中运用的控制水平，尤其是在《老大哥》节目中，是被精心掩盖而通常被大众忽视的。这种控制从挑选参加者的时候就开始了。与其说只是“普通”人，不如说他们是从大量参加者中根据是否能制作出“好电视节目”而专门选出来的，如制造出戏剧效果和冲突情节。接着，他们被各种各样的花招作弄、摆布，比如削减口粮、众目睽睽之下压力陡增、互相为敌。与此同时它还会滞后播出，因此节目呈现是经过审查的，不只是为了减少被骂或者诋毁，而且还是为了“政治”，也就是防止参加者陈述他们的政治观点。

《老大哥》节目的参加者拼的是人气，这一事实尤为重要。而且，这种竞争有着

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与共处一室的同伴友好相处而避免被点名出局；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讨好一般的观众，以便即使被提名还能保住不出局。为了在竞赛中坚持到最后，他们因此必须同时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出卖”他们的个性：为了不冒犯同屋或投票者而对两者俯首称臣，而为了从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又要表现得与众不同。

《老大哥》节目的胜出者获得现金奖励（通常是大概10万英镑，数额可观但算不上巨额），但是真正的奖励是“成名”。名气类似于声望——众所周知——但是也有所不同。声望可以千古流传：亚历山大大帝、莎士比亚、拿破仑和马克思曾经令世人瞩目，声望至今长盛不衰，但是他们的声望靠的是某些功绩而世代不朽——征服已知的世界或者写下鸿篇巨作。名气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而且与现代媒体紧密相连。当然，名气是分等级的，在它的更低等级——所谓名流的C或者D排行榜——只是为了出名而出名；它不需要出众的才能或者成就。诸如OK!、Hello!和Heat这些杂志，专注于鼓噪名声，但关键仰仗于电视这种一直垄断的大众媒体。在电视上出境几次的人多少沾上了名气的概念。在电视上露脸，即使只是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将使你成为杂志的八卦人物，还会给你提供别的职业机会，比如超市开张和圣诞节哑剧的角色，在那里你将会被贴上“在电视上见过”的标签。

38

因此，只要出现在《老大哥》节目上，就是通往名人之路的第一步。胜出，人人向往（尽管希望不总是能实现），至少提供了暂时获得名流身份的入场券。有失众望的失败经常同样奏效，就像“讨厌的尼克”贝特曼和杰德·古蒂。

较低级别的名人对年轻的工人阶级来说有着看似唾手可得的诱惑，这些“普通人”占据了《老大哥》节目和其他“真人”秀参赛者及其观众的大多数，但是这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较低级别的名人必须乐意并且随时准备让他们的私人生活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公共话题。如果他们实在希望保留他们的名气，像乔丹和彼得·安德鲁，乐于向媒体狗仔队奉上私人生活的详尽记录，这些人会像秃鹰捕食一样赖着他们讨生活。

然而，还有一种情况是，《老大哥》节目是现代媒体消极地面对那些深陷其中的公众从而进行羞辱与作践的一部分表现。另一个尤其令人不快的例子是《杰里米·凯尔秀》，这个节目专门列举那些所谓“下层社会”的成员的私人生活加以讽刺嘲笑，非常像贺加斯记录的在18世纪疯人院的住院者为了贵族而游行——区别是疯人院的住院者是违背他们的意志被监禁和摆布的，然而凯尔的“客人们”和《老大哥》节目的参加者们是不惜以蒙羞来换取在电视上露脸的志愿者，电视几乎是伟大的上帝。

想到所有这些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老大哥》节目如此流行（至少直到这套制胜法则过气了）；观众从中得到什么？就像在任何游戏节目中一样，对普通的乔赢

39

得梦寐以求的奖励很明显有几分认同，而同时也可能因幸灾乐祸有所争议，即对那些这样或那样摔了大跟头的人幸灾乐祸。然而，比这两个因素中任何一个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在这种方式下，人们把节目当成了一种谈判和辨别社会行为标准的手段。这与他们在肥皂剧中的手法高度雷同。他们在节目中观察某些人的行为——讨厌的贝特曼的欺骗行径、杰德·古蒂的种族歧视和无知、布莱恩·道林的同性恋倾向——以及这些行为是如何被其他同屋接受的。然后，最要紧地，他们和家里人、朋友和同事对此津津乐道。这个过程通过谈话节目的产物《老大哥的小老弟》在后期有意地得到了滋长放大。

我已经评论过了《老大哥》节目的两个制胜法宝：首先是“真实”的幻象，其次是比拼人气。这样一来，观众逐渐相信通过观看和讨论这个节目，他们了解了如何避免社交排斥和如何变得大受欢迎。而且正是因为他们运用了这种方式植入搭建和监控房间，以及节目整体之中的意识形态是影响深远的。

40 那种意识形态是什么？毫无意外，它是倾向资本主义的自由个人主义。这样一来那些模仿《老大哥》节目行为套路的人们作为个体将会为了名利而互相竞争。他们会“公平”地竞争，意思是他们将不会同别人达成任何契约和联盟；他们将根据从一开始就给出的游戏法则竞争，并且不会去质问那些法则。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有种族或者性别歧视，但是超过这一层，他们就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观点，如果他们有的话也不会谈及。这多少是21世纪早期大不列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写照。

我不是说，在游戏中“植入”这些意识形态立场要么是处心积虑的，要么是节目的主要动力。节目的目标显然应该是盈利（通过吸引大量的观众），隐含的意识形态对于节目制作人来说应该看起来“明显”和“客观”。很可能唯一实际的争论应该是在“认同”领域——种族、性别和性中，这些问题应该是：（a）如何吸引年轻的当代观众；（b）如何避免招惹法制机构。

肥皂剧：《东区人》的案例

电视收视率，一周/截止到2011年5月29日

BBC1	百万
1. 《东区人》（星期一 20: 02）	9.73
2. 《东区人》（星期二 19: 30）	9.06
3. 《东区人》（星期四 19: 29）	8.86
4. 《学徒》（星期三 21: 00）	8.62
5. 《东区人》（星期五 19: 59）	7.79
6. 《神秘博士》（星期六 18: 45）	6.72
7. 《滑铁卢大道》（星期三 19: 29）	6.12
8. 《十点新闻》（星期二 22: 00）	5.74
9. 《霍尔比市》（星期二 20: 02）	5.31
10. 《十点新闻》（星期一 22: 00）	5.30

ITV1	百万
1. 《英国达人秀》（星期天 19: 30）	9.88
2. 《加冕街》（星期一 20: 30）	9.38
3. 《加冕街》（星期一 19: 33）	9.31
4. 《加冕街》（星期五 20: 29）	8.49
5. 《加冕街》（星期四 20: 31）	8.38
6. 《重案组女警》（星期日 21: 02）	8.31
7. 《加冕街》（星期五 19: 32）	8.30
8. 《加冕街》（星期日 19: 01）	7.59

续表

ITV1	百万
9. 《爱默戴尔农场》（星期四 20: 00）	7.36
10. 《欧洲冠军联赛直播》（星期六 18: 59）	7.23

如2011年5月22日至29日的电视收视排行榜显示，肥皂剧，特别是《东区人》和《加冕街》，作为电视上的主导风格保持着垄断地位，电视反过来说又是大众媒体的主导。对肥皂剧如此风行的最浅显解释，是普通工人阶级能够认同这些电视剧里的角色，认同他们的生活、希望和困境，因为这些角色是像他们一样的“普通工人阶级”。换句话说，在真人秀电视前我们只是旁观，而在这里营造着一种对“现实”的诉求和归属感。正如《东区人》的合伙人茱莉娅·史密斯说的，“我们没有制造生活，我们只是反映它”。¹

对日常生活的现实反映，从字面意义上看，在肥皂剧或者任何别的戏剧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现实生活”发生在平时，而且现实生活太过于平凡无味远远不能达到娱乐话题的要求——但这当然不是其所要表达的。恩格斯曾经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²

42 根据这一个标准，《加冕街》和《东区人》远比包括所谓的真人秀在内的大量电视节目要现实得多。角色是“普通人”，不是近乎完人的英雄，或者像在各种美国肥皂剧里的富有幻想的人物，也不是像《欲望与都市》中风情万种的上层阶级，或者像在《老友记》里的那种过度地清闲逍遥、舒适惬意的人群。他们被设定在当代英国，不同于一些怀旧题材，如简·奥斯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或者《楼上楼下》。重要的是，他们是都市里的本地人，这里是大多数英国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居住的地方，而那种老观念要以居住在乡间和村庄为标志来代表英国和“英国风格”（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康斯特布尔的绘画、捕猎狐狸的神话和村庄草地上的板球，而且这种倾向已经在媒体上通过《弓箭手》《杀机四伏》《马普尔小姐》和其他大量电视剧浓墨重彩地体现出来了）。为了营造出悬念重重的结局，生活中的戏剧化程度被大大夸张，

1 资料来源：C GERAGHTY, *Women and Soap Opera: A Study of Prime-Time Soaps* (London, 1991), p.32。

2 资料来源：F Engels, Letter to Margaret Harkness, April 1888,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8/letters/88_04_15.htm。当然，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有更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参考Georg Lukacs,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Film* ,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16 (autumn 2007)。

这起到了扣人心弦的效果，而且这些危机的主题还聚焦于人物角色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虽然如此，它们比警匪片和医患剧更平衡和更“现实”，警匪片在风格类型上主要关注罪犯这一方面（更有甚者，如“超现实的”《火线》），医患剧同样单方面聚焦于病人。

这一相对的现实主义让观众看待这些电视剧的方式与看待《老大哥》这类娱乐节目有相似之处。重要的是，在观看这些电视剧且和家人、朋友、工友等讨论它们时，观众会将它们作为判断举止的准则和标准，尤其在那些观念正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若在有一位成员是同性恋或者被诊断为HIV阳性之类的家庭和社区，我们应该对离婚、背信弃义、家庭暴力、未成年怀孕问题如何作出反应？而且应该说，制作这些电视剧的人深谙此道，因而对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也心知肚明。20世纪90年代的《东

43

在主

在主流肥皂剧中，马克成为第一位被诊断为HIV阳性的角色。剧情响应的是政府的一项“传播相关信息”的倡议。马克的故事也帮助消除了携带艾滋病病毒必死无疑的传言。他在因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去世之前携带病毒生活了13年。泰伦斯·希金斯基金会与制作团队在这部电视剧播出期间有合作。所有与艾滋病病毒相关的公共卫生宣传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英国要求检测的人数最多时出现在1991年1月，即马克·福勒被诊断为HIV阳性之时。卡蒂（马克·福勒的扮演者）曾经评论，“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在人们对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存在很多误解的时候向大家进行了知识普及……我主要关心的是节目正确地反映了事实，总的来说，我相信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它显示了某些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仍活着，而不是死于病毒。”¹

最近涉及家庭虐待儿童的剧情因提高了人们对“隐形性虐待”的意识得到了“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学会”的赞扬。正是这种作为道德仲裁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电视剧偏离了特定意识形态意义的“现实主义”。有关《东区人》的三个特点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它的主人公们并不是地道的工人阶级。伦敦东区是工人阶级居多的区域，而《东区人》通常被假想为以工人阶级角色为主并代表工人阶级的生活。事实上，它的大多数主要角色是小业主。登和安吉·瓦特拥有和经营着“维多利亚女王”，和佩吉·米切尔还有现在的凯特和阿尔菲·穆恩一样。佩吉·米切尔经营一个汽车修理厂

1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Fowler。

44 和一家夜总会，伊恩·比尔是一位有着一家小店和一个市场摊位的“私营业主”。布兰尼兄弟拥有一家汽车经销行和一家拳击馆，甚至19岁的惠特尼·迪恩也经营着一个市场摊位。那些真正干工人阶级工作的角色，像里基·布彻或者卡罗尔·布兰尼，通常为上述的商人或者别的本地公司打工。尽管马苏德·艾哈迈德受雇为邮政工人，对比起大排档和小餐馆的家庭自营者，这样的背景也大大不一样。

这是明显的虚假描述，不仅对东区的生活而且对英国的总体生活来说也是如此。在全国范围内自营者占工人总数约12%；在伦敦它稍微高一些，达到15%，但仍然是势单力薄的少数派。造成这种曲解的一个原因无疑是电视剧的戏剧效果所要求的，所有的角色应该互相熟知并且家喻户晓（然而大城市的生活现实是，你通常不认识你隔壁的邻居，从不留意与你同住一条街道和广场的所有人）。可是，它的影响是《东区人》一剧系统地排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主要生活经验，也就是受聘于与他们没有私下联系，也不熟知的雇主（主要是中等规模雇主或者大老板）。

这样一来，尽管它很火，但是《东区人》沿袭而不是挑战工人阶级的普遍缺席状况，遍布在我们的文化中，从好莱坞电影到小说比比皆是。

其次，是少数族裔代表不足。恰恰因为东区长期以来居住着工人阶级和穷人，自17世纪的胡格诺派教徒和19世纪的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以后，它也是一个外来移民高度密集的地区。它现在是英国文化最多元的社区。因为阿尔伯特广场和沃尔福德都不是真实的地址，《东区人》一剧没有真实的地点，但很清楚它设定在哈克尼区和陶尔哈姆莱茨区一带的某一处地方。让我们来简单看看这些地方城镇人口的种族构成。

哈克尼区由48.45%的英国白种人、13.36%的其他白种人（白种人总共61.81%），大概12%的亚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和中国人等）和大概22.5%黑人（英国黑人、加勒比海人和非洲人）构成。也有7%的沙迪犹太人（哈西德派或者极端传统的），6%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被归入“白种人”当中去。¹陶尔哈姆莱茨区有44%英国白种人、8%其他白种人（白种人总共52%）和30%孟加拉国人。²这与英国92%白种人、7.9%少数族裔，还有大概4.4%亚洲人和2%黑人的数字形成对比。³

显然，东区的少数族裔人口在《东区人》一剧中大大地被忽略了。2002年“种族平等委员会”的一份研究发现，超过四个星期有色人种在《东区人》中露脸的平均比例是9%。这意味着种族代表不足？客观地说当然是的。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在我看来，制片人将其归因于他们的观众（全国上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温和的”种族主义，这样的种族主义会导致他们不认同或者不观看几乎一半的角色是非白色人种

1 资料来源：<http://stats.bis.gov.uk/UKSA/tu/TUM2010.pdf>。

2 资料来源：http://www.towerhamlets.gov.uk/lgs/901-950/916_borough_statistics.aspx。

3 资料来源：<http://www.statistics.gov.uk/cci/nugget.asp?id=455>。

的节目，而不是任何有意的歧视。然而，它所表明的是，面对合理而准确地体现少数族裔和电视剧的成功（取决于收视率）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时，前者往往因后者而被牺牲掉了。

这种选择在已经露脸的少数族裔角色出场的方式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这些非白种人角色是否得到了正面的、积极的呈现，而是指他们通常被描述为孤立的家庭，而不是孟加拉人、西印度人或者土耳其人的社区的或者社交范围的一部分。我们在《东区人》中看到的唯一的“社区”是白种人的，非白种人在其中即被“接受”或者与之融为一体。通过白种人塑造角色，也使得针对个人的种族问题减少（或多或少接受它、或多或少容忍它）。这样一来，就回避了少数族裔经受的许多种族歧视的主要形式：来自警察、法院、教育系统、雇主、移民局等的制度化种族歧视。《东区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大胆地”处理那些与性别和性爱有关的事件，这几乎不成问题，但种族歧视事件则不一样，种族歧视在真实的东区不仅在现在而且一直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掉了。

最后，代表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经历的这些缺失直接导致了第三个关键特点：《东区人》显示了一幅东区生活中几乎完全非政治化的图景，暗含的意思是，这也显示了英国的工人阶级生活。在开播的26年里它最接近严肃政治的故事情节发生在2009年佩吉·米切尔身上，她是酒吧老板，因此属于中产阶级，她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代表议会，随之附上从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一个视频博客中的建议，还有一位客串友人鲍里斯·约翰逊露脸。¹据笔者所知，一位重要的具有左翼政治主张的角色从来没有单独出现过。

现在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普通人、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并不“介入”政治，这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政治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但大多数人多少有些政治观，还有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包含着至少一个左翼少数派、社会主义、激进工会主义者和积极活动分子，这也是真的。除非这种情况属实，要不然在英国就永远不会有工会和劳工运动（或者极左派）——所有这些显然是存在的。而且，伦敦东区长期以来是格外政治化的区域，这在英国的劳工运动历史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尤其是在反法西斯和反战斗中。这方面的例子包括：1888年的火柴厂女工罢工和1889年码头工人六便士罢工；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和东区妇女参政论者；乔治·兰斯伯里和波普拉区议会；极负盛名的1936年“凯布尔街战争”，当时东区的人们主要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制止了莫斯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游行企图；1972年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保证了“本顿维尔五人”被释放；还有1978年“反纳粹联盟”/与“冲突”乐队一起反对“种

1 我猜这是BBC的政治平衡观点：一名工党、一名保守党——两名右翼。

族主义狂欢的摇滚”。而且这是一种传统，在《东区人》播放期间并且一直到现在都在持续的一种传统。1986年在沃平看到警察与纠察队战斗；2003年东区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主力军；2011年8月哈尼克区和贝思纳尔格林区的骚乱，还有2011年9月3日“保卫英国联盟”游行经过陶尔哈姆莱茨区时被制止。

然而这些事情无一在《东区人》里出现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拒绝面对政治的态度不是政治中立。这是安于现存政治，即资本主义政治，完全不挑战现实。一名“无政治倾向”的工人阶级正是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东区人》不仅是肥皂剧的典型，而且是所有电视剧的典型，还是整个大众媒体的典型。当然也存在奇怪的例外，但是例外的罕见程度真的足以证明规则。

广 告

广告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它不可避免地与之俱增。48
它带来两种效应。首先，它直接影响媒体和制造商的选择：在《制造认同》一书中，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在大众媒体功能的“宣传模式”中赋予了广告一种重要角色。他们将它排列在五种“过滤器”中的第二位（其他则为：媒体拥有者的规模和财富，作为信息来源的媒体对政府和商业的依赖度，“高射炮抨击”——敌意评论和强权行动——作为媒体管控的一种方式，还有作为国家宗教和控制机制的“排共”言论），他们认为，它确保并且强化了媒体大力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

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大众媒体的主要广告商是大型集团公司，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玩得起大型的广告战。对于大多数大众媒体来说，广告是它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至于商业电视台、电台、脸书、推特和优途，广告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至于报纸和杂志，源自于广告的收入远远超过销售所得。正如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所言，这产生了两方面的主要影响。

首先，独立的或者反对资本主义的媒体几乎不可能在市场上与维护资本主义立场的媒体集团竞争。后者会接到大量的广告而前者接到的广告聊胜于无。这反过来使得媒体集团能有更高的生产价值、更优的分配系统来运营，还有最致命的是，能以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去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或者越来越多地去发起免费赠送。没有49
与之匹敌的广告收入，反对资本主义的媒体根本不能与其较量。它也意味着，比起那些面对较穷的工人阶级读者群的较高发行量来说，面向具有强大购买能力的富裕阶层、高端读者的相对低的发行量更加吸引广告商（因此获利更多）。

《每日先驱报》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在实践中如何发挥这些作用的绝佳例子（摘录自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但以詹姆斯·卡伦和珍·西顿1985年在伦敦出版的《不承担责任的权力：英国出版与广播》为基础）。《每日先驱报》1910年起家于印刷工会“伦敦排字工人社团”的《每日罢工公报》。之后，在码头工人的领袖本·蒂利特、左翼工党政治家乔治·兰斯伯里还有其他激进工会分子的支持下，它发展为永久的工人运动日报。1922年“英国劳动联合会”统领了该报，直到1929年该

报一直效命于它们的官方机构。1930年“英国劳动联合会”将该报51%的股份卖给了俄德汉姆出版社，也就是《人民》的出版商，但是它明显保留了维护工人运动的导向。1933年之前它可能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报纸，1964年之前它拥有470万的读者，“《每日先驱报》几乎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三家读者总数的两倍”。¹但是在1964年，该报拥有8.1%的全国性日报发行量却只得到了3.5%的净广告收入，被迫停刊。它改名为《太阳报》东山再起，1969年被默多克接管——后果大家可想而知。类似的命运发生在英国的其他两家左翼倾向的高发行量报纸身上，《年谱新闻》和《雷诺兹新闻》。支持自由党的《年谱新闻》，在1960年停刊后被右翼的《每日邮报》接管。《雷诺兹新闻》周刊（后来的《周日公民》）与合作党有联系，转而隶属于工党。它在1967年被迫停刊。

50 其次，电视台和报社二者对广告的依赖为主要广告商（即大集团）提供了政治方面实实在在的否决权。如果有媒体播放或者出版材料不对广告商的胃口，它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取消了合同。（这当然，不是任何形式的审查——但愿老天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既然集团公司有着完全的权力决定在它们觉得合适的时候花钱。）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对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公共电视台WNET1985年在播放纪录片《追求利润》之后失去了来自“海湾+西方”公司的基金，这部纪录片揭露了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行为。甚至在节目播出之前，预感到公司反应不妙，电视台高管就“竭尽所能地删减处理”（根据电视台的一则内部材料）。“海湾+西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埋怨电视台说该节目“如果不是反美就是反商业”，电视台播放这样的节目不是公司的“朋友”应有的行为。伦敦《经济学人》说“大多数人相信WNET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²

这儿最重要的话是来自《经济学人》那最后一句，而且关键之处不是这种权力有多么频繁发威，而是在大多数时间里它无需出招。它只需要不动声色地作为一种内化于所有的媒体从业者心里的威胁就足够了。正如《太阳报》的记者知道编辑所需要的，而编辑知道默多克所需要的，因此三者都知道广告商需要的是什么，并且尤其清楚广告商不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那些任何损害它们的特殊利益或者任何“反商业”

1 CURRAN J. Advertising and the Press [M]// HERMAN E. and CHOMSKY N. Manufacturing Consent. Roman: Pantheon, 1988: 15.

2 CURRAN J. Advertising and the Press [M]// HERMAN E. and CHOMSKY N. Manufacturing Consent. Roman: Pantheon, 1988: 17.

之类的内容。

然而，除了这种对新闻和时事的报道多少有直接的影响之外，广告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媒体，通过媒体，又塑造了我们的整体文化氛围。这是总体事实，广告自身占据了媒体产出的很大一部分，并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见的全部视觉图像中占据了相当比例。在每一档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除了BBC和其他公共服务广播）播出时，都有广告穿插其中；每一份报纸、每一种彩色增刊、每一本杂志上都遍布广告；广告出现在每一个城镇的街道的每一个公告板上，在每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在每一个火车站、汽车站和每一个酒店前台，环绕每一个大型露天足球场的四周和每一名足球运动员的背上，在每一辆赛车的底盘上和这个社会其他每一处人们有可能聚集的地方。除了它试图说服我们购买商品的内容之外，每一则广告几乎毫无例外都在为资本主义打广告。

对此最好的解释之一，是约翰·伯杰在他杰出的艺术著作《观看之道》（1972年）的最后一章提出的。我在此提供一些精选的语录（请注意我称之为“广告”，伯杰称之为“公示”）：

在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所有人每一天都看见数以百计的广告图像，没有其他图像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历史上没有过其他社会形式曾经如此注重图像，视觉信息还如此密集。

一个人可能会记住或者忘掉这些信息，但是只要这个人短暂地让它们进入过脑海，过了一会它们就会通过记忆或者期待的方式来刺激想象……

我们现在是如此习惯于接收这些图像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整体冲击……我们接受广告图像的整体体系就像我们接受气候变化……

广告通常被解释和证明为一种竞争性的媒介，它大体上有益于公众（消费者）和大多数有能力的制造商——从而也有益于全国经济发展。它与某些有关自由的观念密切相关：对于购买者的选择自由、对于制造商的创业自由……广告被认为提供了一种自由选择。

没错，广告可以制造品牌、公司间的竞争；但是，每一幅广告图像也确实是在认可其他的广告……推动广告商去制造同样的大致提案。广告在这种奶油和那种奶油之间、这种汽车和那种汽车之间提供了选择，但一套体系里的广告却只制造了一种单一的提案。

它建议我们每个人通过多买一些东西改变自己，或者改变我们的生活……

广告越来越多地用性感手法去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在你能买到任

何想要的东西的好生活中。

广告用消费替代了民主。一个人吃的（或者穿的或者驾驶的）选择取代了重要的政治选择。广告有助于掩盖和补偿所有那些社会里的不民主……但是相对于它推荐的广泛选项，它提供的选择实际上非常有限。除了获取的利益之外它什么都没有提供……

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是通过强迫大多数人，那些它剥夺的人，去尽可能狭隘地定义他们自己的利益。¹

53 这几行文字写于1972年，过了四十多年后这些文字甚至显得更真实、更中肯。娜欧米·克莱恩的《拒绝品牌》一书披露，美国的年广告支出总量从1979年的50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000亿美元²，而目前估计到达3,000亿美元，而且，正如作者一起披露的，这些广告支出与大集团公司尤其有关，并且是由它们驾驭的（耐克、盖普、汤姆·希尔费格等），同时也与品牌的增多有关。宣传这些巨型公司就是宣传资本主义。

约翰·伯杰在上文提到，广告的司空见惯掩盖了它的极权特征。面对这种情形我们有必要阐述几点。首先，当偶尔有反对资本主义观点的文章（一篇约翰·皮尔格写的或者一篇舍马斯·米尔恩写的）见诸主流媒体时，还有这样的人物非常罕见地出现在《提问时间》或者《新闻之夜》时，反对资本主义的广告是不会出现的。这样做确实不是出于什么阴谋使然，而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他们有钱；我们没有。同样地，大集团公司可以覆盖整个城市的公告板海报，为这种或那种商品造势。而任何想宣扬反对资本主义的事业和运动的人可能只发得起（非法地）小传单——这再次说明仅仅是因为经济拮据。

54 广告文化是一种惯常“撒谎”的文化。鉴于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被默默忽略，我们必须加以强调。广告业裹挟着人为策划的痕迹。当然，大多数时间里它通过建议、暗示而不是通过法律上有迹可循的弄虚作假来撒谎，但无论法律上是否能确证，它们都是谎言。产品根本不是新的，在广告中也被当作新的来包装；食品明明不是自制的，广告也说成是自制的。如果有六种牌子的洗衣粉，它们不可能都洗得最白。每一家汽车保险公司都承诺省了钱——省在哪呢？省了你可能与所有其他保险公司较劲的功夫罢了。航空公司报出的廉价航班标题——仅仅9.99英镑起步！“起步”是关键词——有一趟价值9.99英镑的航班在早晨四点起飞，这个时候得花50英镑去

1 资料来源：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London, 1988), pp.129-154. 伯杰所写的观点可以对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对“金钱的权力”所作的分析。

2 资料来源：Naomi Klein. *No Logo* (London, 2000), p.11.

机场，而加上税前的费用、订票费、行李托运费和其他七七八八的费用，价格高达60英镑。这些案例和数以千计的其他骗局变得理所当然、见怪不怪了。

更重要的是，广告的语言——哄骗人们掏钱的花言巧语——总是被大为赞誉。在“营销”的名义下，它变成了我们都应该去做的某些事情。政治家们应该推销他们自己，亮出“准备好改变”“是的，我们能！”，或者“让我们回去工作！”的口号。大学和学院必须推销自己，吹嘘它们是“全国和全世界认可的顶级中心”（如果没那事也照夸不误）。慈善机构应该推销它们自己，从而获得慈善市场更大的份额。

当然，也会有事与愿违的时候。在媒体的影响下（参考第4章），被广告滋生出来的消费主义会导致那些买不起鼻子前晃动的商品的人怒火中烧，“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出现2011年8月伦敦骚乱中的打劫。然而，广告的整体效应加深了贯穿在媒体中的拥护资本主义的倾向。

只给读者他们所需要的吗

55 那种认为媒体的新闻报道保持政治中立或者只是“报道事实”的观点禁不起片刻仔细的推敲；同样地，正如我们看见的，那种认为轻娱乐节目是没有政治性内容或者与政治毫不沾边的想法也不可信。然而，媒体的辩护者有一种更狡猾的诡辩：他们可以声称，媒体提供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明的也好暗的也好，不是媒体产业强加给公众的东西，而是公众已有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的反映。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给了人们他们想要的”。

如果我也像默多克一样被尖锐的访谈者刁难，我也会进行这种诡辩。我会说：“《太阳报》是英国最畅销的报纸。它一天卖出300万份，它与《卫报》卖出的不到30万份形成对比。至于代表工人声音的所谓左翼报纸，我怀疑它们是不是一周才卖出3万份。没有人强迫大家去买《太阳报》，他们买是因为他们喜欢，因为《太阳报》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这种辩护如果被接受，将用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体产品——《福克斯新闻》、《英国偶像》、“诺丁汉大学学生电视台”和《古怪》，任何媒体只提供流行畅销的内容。

56 我们相信这样的辩护有一些道理。如果一大摞《太阳报》挨着差不多高的一大摞《社会主义工人》或者《晨星》放在报亭的柜台，而消费者被邀请随意免费领走一份的话，毋庸置疑，领走《太阳报》的人会比领走任何一份左翼报纸的人要多得多。同样地，如果两场音乐会在电视黄金时段的同一时间播出，一场是约翰·科特兰的，而另一场是碧昂丝的，后者吸引众多观众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在这些辩护中找到一些事实，不意味着接受这种辩护全部都是真实的。举例来说，布什和布莱尔无休止地重复的那些辩词，什么因为萨达姆·侯赛因是残酷的暴君，所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正义的，这种辩护包含着萨达姆是暴君的些许事实，但是总的来说是一个谎言，因为

包括萨达姆是暴君的事实在内的众多原因并不是挑起战争的真正原因。

既然如此，“只给读者他们想要的”这一宣言至少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议题：（1）为什么人们想要那些东西？（2）为什么媒体给予人们那些他们想要的东西？（3）媒体是真的只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吗？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媒体选择

公众的口味是由什么塑造的？这明显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绝不可能、当然也不适合在这个小薄本里充分讨论。然而，关键的是，很多人更喜欢《太阳报》或者碧昂丝的原因，与他们的社会条件有关，而不是与他们的先天能力或者任何与生俱来的右翼倾向有关。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大多数普通人能完全理解严肃的政治观念，还会欣赏高雅艺术：俄国革命时数以千计的工人涌进彼得格勒圆形现代体育馆去听文化委员会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讲希腊悲剧；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置顶畅销榜；斗志昂扬的工会成员阅读《金融时报》去了解“另一方”正在想什么。

57 我认为人们的社会条件是指他们从出生以来的整体生活经验：从他们的婴儿哺育时期，经过念书时期到成人后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事情，还有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呈现给他们的方式。

大量的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表明，从小学到大学任何一个阶段的教育成就，都与社会阶级背景紧密相关并且深受其影响。人们长期以来对到底哪些阶级经历的特殊方面——收入、父母的态度、同辈的压力、学校和老师的倾向等——是造成上述关联的最重要原因而争论不休，但是对这种关联本身没有产生质疑。举例来说，《卫报》在2006年曾经报道：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学者的研究为一种观点提供了支撑性的统计数据，这种观点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是否优异不是取决于他们上了什么类型的学校——而是社会阶级……

这份报告采用了之前教育与技术部没有披露过的信息，比对了大约100万名11岁和15岁的学生的家庭地址和考试成绩……

这项史无前例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孩子的社会背景是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另外，一所学校的成功不是取决于它的老师、它运营的方式或者它属于

什么类型的学校，而是取决于它的学生的阶级背景。¹

再者，2008年的《独立报》也曾报道：

政府的教师培训主管今天承认，在公立学校，孩子们的社会阶级仍然是决定他们学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培训和发展机构的主管格雷厄姆·霍利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说，“一所学校的业绩和其中一个孩子的成绩都与社会阶级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时光倒转15年，对今天学校里的学生，你可以根据他们的出生地点预测他们的成就，你完全可以做得到。”²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很明显的。父母的收入与阶级相关，会影响孩子们接触到的书本数量、接触到的学习空间、参加丰富的假期活动的机会。阶级偏见，尽管这点很少被公开承认，却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潜意识或者半意识的层面），会影响着一所学校对一个孩子成绩的期待和评估。早已料到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往往最后干的是工人阶级的工作，这一点既会影响父母也会影响学生对待教育的态度。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和很多其他因素，会以一种恶性循环的方式互相加固，很大一部分能力绰绰有余的孩子成就平平，然而同时，人们却很可能以孩子们自己的能力欠缺或者智商不足为理由来解释这种情况。与此相反，上层阶级能够花钱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大量的教育优势，包括所谓的公立学校，还有随之而来的顶尖大学的学费、名额。

这种情况转而对他们的媒体和文化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的“经验”已经制约了他们，他们感觉到某些报纸、杂志、电影、书籍、音乐、音乐会等“不是面向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然而，他们会对其他的媒体感到“亲切舒服”得多，这是双向过程——所有媒体产品都是有意识地针对特定社会群体来设计的。回到《太阳报》的例子，它与《泰晤士报》一样属于同一个公司和个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有着基本一致的右翼政治立场，但它是为工人阶级读者量身定做的——它几乎是以工人阶级的语调来写的——然而《泰晤士报》则同样强烈地表现出对中上阶层的忠心耿耿（向中上层阶级示意效忠）。

工人阶级生活的不能回避的事实——时间冗长、高压强度、繁重单调的工作——是另一个因素。很多人，在工厂、办公室，或者应付孩子筋疲力尽地度过一天之后，

1 资料来源：“It’s official: class matters” Guardian, 28 February 2006.

2 资料来源：“Social class determines child’s success”, Independent, 18 September 2008.

只会觉得太过于劳累而不能应付需要太过专注或者费神的报纸、书本、电视节目，而提供新闻和娱乐的集团当场奉上简单轻松的阅读、声音、视频简直是正中下怀。这不是单单投工人阶级所好。每一个人，包括教授和博士生，都会时有同感——正如人们说“我只是喜欢看一些不伤脑筋的废话”——但工人阶级生活的本质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人们，即大多数人，比起中上层的人来产生那种感觉的时候要更多。

在这里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明白激进和富于挑战性的想法总是显得比维护现状的想法更麻烦。考虑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女王？”保守派和保皇派们五花八门的答案——因为她代表英国、因为这于国家有利、因为她吸引全球游客、因为君主制维持政权稳定——种种理由解释起来只需要轻描淡写的只言片语，而真正的答案则牵扯到历史教训。

然而，这里还涉及某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这是一个需要稍加解释的哲学术语，但是与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马克思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初期写《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陈述他的异化理论的，这对他之后所有的理论工作来说一直极为重要。他的出发点是，改造自然的劳动，对我们成为人类和对人类历史的全部来说都是首要的。人类正是通过劳动、生活资料的生产，将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开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从采集业到农业和工业——与单纯的自然史大不一样。人类正是通过改造自然的劳动真正创造了他们居住的世界，从而也创造了他们自己。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们，尤其是工人，无法掌握他们的劳动和自身劳动的产品。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也就是被他人（如雇主）操纵，变成某些异化物反过来摧毁工人：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¹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效应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工作寿命”：我们同我们自身

1 资料来源：<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manuscripts/labour.htm>。

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有意识地改造周遭世界的能力相异化；我们同他人，也就是与我们相对立的竞争者相异化；我们同自然界和我们的环境——正在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威胁的生死存亡境况相异化。

这种一般社会的、个人的异化如何体现在我们讨论的主题中，即在媒体中“人们需要什么”？首先，它意味着，他们有可能需要堕落的、有破坏性的，包括损害自己的内容。毫无疑问他们果真如此。供不应求的有：(a) 无端的暴力——动作片、漫画书、电子游戏等；(b) 无缘无故的色情——不只是色情产业这样、连主流电视也是（经常冠以“纪录片”来加以掩饰）；(c) 一般以一种偷窥的方式来表现的“怪诞秀”内容。它也意味着，人们按照人类的渴望和特性来创造上帝的形象和天堂的景象，因此那些在他们的劳动中同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的人们，也赋予了金钱和商品半神半人的力量。而大部分媒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种拜物教，正如我们所见，不仅通过游戏娱乐节目和广告这些表现得最为明目张胆的方式，而且通过很多诸如生活专题和产品植入等别的方式进行。

61

异化的整体效应是人们不能控制他们的世界或者生活。他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和备受轻视，像《摩登时代》里的查理·卓别林一样无可奈何地沦为“机器的附属”——甚至，应该说，在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宽裕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产生了幻想拥有权力和获得认同的需要——能在《英国偶像》中为赢者投票或者在《舞动奇迹》中“挑战”评委去力挺约翰·萨金特，或者与像苏珊·鲍尔、仙黛尔那样有朝一日成为超级明星，等等。很明显，这是媒体非常乐意满足的需求。

异化也会产生某种抵抗，甚至是敌意，对物质的——艺术的或者政治的抵抗——确实能威胁到异化。服刑时间长的囚犯经常变得“循规蹈矩”而不能适应监狱之外的生活。类似地，很多人对他们所默默忍受的异化习以为常，很多人心甘情愿任由摆布还抱着维持现状的生活态度，发现媒体报道在指出或者分析他们承受的异化或者号召他们反抗或者展示他们的潜力时——比如比利·哈乐黛的一首歌或者品特或布莱希特的一出戏或者肯·洛奇的一部电影——会感到痛苦不堪并心生排斥。媒体再一次乐于效劳，将这些令人不适的内容播出量控制到最少。

62

一勺糖……

如果媒体正在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问，不仅要问为什么人们需要它，还要问为什么媒体会投其所好。这样的问题非常简单，答案也相当明显，但是它事关重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页中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品。”¹如果人们不需要任何特定的商品，如果它没有“使用价值”，像马克思说的，资本家就卖不掉它。但是，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销售商品；相反资本家是为了盈利而销售商品，一旦利润停滞就会叫停销售和生产。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人们需要某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被生产或者人们一定会得到它。世界上有数以百万的人急需食物，但是因为他们穷，给他们供应食物获得的利润是微薄的，因此他们只能忍受饥饿。有人需要便宜实惠的房子，也有人需要豪华奢侈的酒店，但如果满足豪华奢侈的酒店这种需求更有利可图，那就往往被优先建造。

63 这有点像媒体产业，几乎所有的媒体产品都采用商品的形式。首先，它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需要，控制着99%大众媒体的资本家们（或者政府任命者们）可以决定满足或忽略某些需求。举例来说，如果在公众中有一种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新闻进行简明而准确的报道的需求，那么有可能响应这种需求的是浅显易懂但不在于它是否确凿（就像任何的市井小报）的新闻播报，或者有可能是提供相对精良严谨的新闻报道但却以一副曲高和寡的面目出现（像《金融时报》）。

另一种情况就是向人们提供他们还真想要的东西——娱乐节目、喜剧和梦幻片等——但捆绑别的一些观众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休想讨价还价。当然，这是贩毒者的策略，我将烟草公司归为此列。但《太阳报》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尤为突出的。《太阳报》的读者毫无疑问需要一份轻松、简练、直白地统揽世界的报纸——他们可能也很需要一份符合他们口味的报纸——但是，他们需要一份该报老板鲁珀特·默多

1 资料来源：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1974), p.41。

克所支持的无论哪个政党宣扬的宣传精神混在其中的报纸吗？

同时，默多克所关心的不只是一个《太阳报》的直接销量的问题。这是一个有着全球业务利益的全球集团巨头，还有着强烈的政治或者阶级本能。因此事关《太阳报》编辑方针的重大决策，反映了包括避开给左翼以安慰言论，也就是避免以任何方式挑战默多克支持的和确保新闻集团利润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

只是必须强调的是，默多克有多么直接地玩弄政治，尽管常常是暗中运作。从杜鲁门开始他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有过私人会晤。2008年他与奥巴马在纽约的华德福·阿斯托里亚酒店会见。根据迈克尔·沃尔夫（默多克的传记作家）在《名利场》中所记载：

64

从默多克的角度来说，他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与奥巴马分享。他可能认识很多国家领导人，几乎认识任何一位今天健在的……而这是他所了解的：没有人有这么多时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领导能力与头半年的行动有关。

然后，在他说完之后，默多克换了地儿让他的特殊客人——罗杰·艾尔斯（福克斯新闻的总裁）与奥巴马促膝交谈。

奥巴马痛批了艾尔斯。他说福克斯已经无情地把他描述成可疑的、外国的、可怕的——就是恐怖分子之类，如果福克斯只是想继续丑化他和他的妻子的话，他不想浪费时间与艾尔斯谈话。

艾尔斯镇定地说，如果奥巴马更愿意来露脸而不是经常对福克斯甩手，情况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一种试探性的休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重大历史意义，在那一刻达成了协议。¹

20世纪80年代，他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交往甚密，所有他的报纸都极力支持她。在梅杰任内继续支持保守党，众所周知，《太阳报》宣称为梅杰赢得1992年大选立下了汗马功劳（标题是《〈太阳报〉知道会赢》）。然后默多克在布莱尔飞到澳大利亚与他进行私人会面之后转而效忠布莱尔。交易的条件看起来应该是默多克会支持布莱尔，他反正可能会赢，工党作为回报，停止限制英国媒体的外国持有权（也就是默多克的所有权）的提议。但是，当然，布莱尔的右翼、新自由主义、亲美立场也与默多克情投意合。2008年8月在默多克的游艇上大卫·卡梅伦前来与他会面（免费航班，承蒙默多克的女婿马修·弗洛伊德的好意）。默多克和他的报纸在那之后迅速掉头回

65

1 资料来源：<http://www.vanityfair.com/culture/features/2008/10/wolff200810?intcmp=239#gotopage2>。

来支持保守党，而《世界新闻报》前编辑安迪·库尔森出任卡梅伦的联络主管，一直到电话窃听丑闻爆发为止。

默多克如何操纵《太阳报》和他麾下的其他畅销报纸，其中当然包括2011年7月之前的《世界新闻报》，只是最为明显地反映了大量媒体如何运作的冰山一角——右翼，包裹在运动、色情和名流丑闻的糖衣炮弹里的倾向资本主义的政治。这样一来，作为所有媒体的“借口”，也就是媒体只提供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然而，值得补充的是，对统治集团来说，存在像这样一种以虚实参半、鱼龙混杂、庄谐一体的所谓“西式民主”，正如《欢乐满人间》中说的，“一勺糖有助于服下苦药”，此言不虚！

4

媒体有多强大

66

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媒体在与我们社会中其他权力中心（即政府、国家、所有大公司）的关系中有多强大？媒体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普通大众的想法？我将逐一思考每一个问题。

媒体与统治阶级

当我们看到布莱尔飞到地球的另一边去毕恭毕敬地会见默多克，或是看到政治家们整日因某项政策为如何与《每日邮报》周旋得当而忧心忡忡，很容易会以为媒体是“无所不能”的。默多克电话窃听丑闻期间，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中，托尼·本（工党左翼领袖）形容默多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也是在丑闻的处理期间，我发送了一条视频信息，戈登·达夫在里面肯定地陈述，“默多克承认现在已经控制了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二十来年。他有着选择国家领导、制定政策、随意推动法案通过的能力”。这些来源在价值观上是不一致的。托尼·本是一名经验丰富、非常受人敬重的左翼人士，戈登·达夫是一名有一点反犹倾向的、疯狂的阴谋理论家，但是他们两位都阐述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是我不同意的一个观点。

67 很明显，总的来说媒体在世界上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样明显的是，一些最大的媒体集团——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贝卢斯科尼的帝国——是主要的经济政治玩家。然而，正如我们从上面达夫的引述中看到的，人们很容易错误地夸大这种能力并且将媒体全部或者特别的媒体人物看成是世界的统治者。的确，最近的电话窃听丑闻恰恰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默多克真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或者真的控制着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他就不会被迫关闭《世界新闻报》，罢免他的得力干将莱斯·辛顿和他的得力下属丽贝卡·布鲁克斯，或者飞往英国低声下气地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出庭作证。同样地，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尽管贵为意大利总理并拥有三大电视台，也在意大利法庭上面临多项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质疑。迄今为止，他经历所有这些事情仍屹立不倒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权力，但如果他真的是无所不能，即使在意大利，更不用说全世界，他都根本不必面对他们。

为了评估媒体权力的范围和极限这两个方面，我们需要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通常是如何运作的。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马克思说的有关政治权力的基础。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

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¹从这个起点开始，他接着往下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²

政治权力，因此，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这不是简单的机械关系，但经济是基础。正如恩格斯所写： 68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³

对马克思而言，社会通常由占有和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的社会阶级统治，而现代社会由资产阶级统治，“现代资产阶级，即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就像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定义的。资产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他们就像在“敌对的兄弟”，为了盈利互相竞争但是又在压制工人阶级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为了使社会管理的一般事务符合自身利益，资产阶级创造并运用了国家机器。“现代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国家必须既克服资本家之间的分裂又维护资本主义对抗任何来自底层的威胁。

媒体是怎样与这些状况相吻合的？首先，正如我们知道的，媒体压倒性地由诸如“时代华纳”“迪士尼”“Organizacoes Globo电视台（巴西）”“日本电视网络公司

1 资料来源：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1985), p.48。

2 资料来源：Karl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 McLella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Oxford, 1997), p.389。译文参考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译者注

3 资料来源：Frederick Engels, *Letter to Borgius, 1894*,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Letters/94_01_25.htm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Letters/94_01_25.htm。译文参考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页。——译者注

69 (日本)”“布依格公司(法国)”“新闻集团”等大公司集团占有和掌握,所有这些大公司集团的老板都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以公众名义占有的那些媒体,则由代表着资本的集体利益的国家控制。

然而,媒体绝不是统治阶级的支配部分。让我们从纯粹的经济角度开始讨论。有若干衡量公司规模的办法——通过收入、利润、资产、员工等——还有种种世界顶级公司的排行榜。但无论以何种标准,在所有的排行榜上,最大的媒体集团比起最大的跨国公司来说都相形见绌。维基百科前200强排行榜是根据收入来排列的,沃尔玛(4,210亿美元)置顶,紧跟其后的是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3,700亿美元)和荷兰皇家壳牌(3,680亿美元)。¹在这个榜单上,没有媒体公司进入前200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也是根据收入来进行排名的,它将沃尔玛(4,210亿美元)、皇家荷兰壳牌(3,780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3,540亿美元)排在前三强的位置,然而排名最高的媒体公司迪士尼(380亿美元),出现在226名,紧跟其后的是新闻集团(327亿美元),出现在284名;时代华纳公司(268亿美元)排在363名。如果范围限制在美国,财富500强将迪士尼排在65名,新闻集团排在83名,而时代华纳在95名。²《金融时报》全球500强通过“市场价值”来排名,在这份榜单上媒体公司的排名靠前一些:迪士尼(810亿美元)排在75名,新闻集团(470亿美元)排在171名,时代华纳公司(390亿美元)排在211名。但从全部500强来看,与76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75家银行相比,只有12家媒体公司跻身其中。³维基百科和《金融时报》的一份综合排行榜也可以让我们根据员工的人数来比较这些公司。迪士尼雇用149,000人、新闻集团雇用5,150,000人、时代华纳31,000人,对比沃尔玛的2,150,000人、特斯科492,000人、西门子405,000人、大众汽车329,000人和汇丰集团302,000人,相差悬殊。

70 在统治阶级内部,规模相对较小(当然,相比起小型的或者中等的商业来说,它们是巨头)对媒体公司的影响力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举例来说,它们通常不属于那种“太大了以致不能倒闭”的公司之列。当默多克关闭《世界新闻报》的时候,主要的后果是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而不是经济上的影响(除了失业的工人之外)。同样地,一般而言,媒体公司不能以搬迁换址来要挟政府。默多克不能将《福克斯新闻》或者《太阳报》搬到印度尼西亚,或者将《华尔街日报》搬到墨西哥边境。

那么,媒体的政治力量是什么呢?在这里,有必要将政客个人、政党、政府和国

1 资料来源: http://en.wiki/List_of_companies-by_revenue。

2 资料来源: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global500/2011/full_list/。

3 资料来源: <http://media.ft.com/cms/33558890-98d4-11e0-bd66-00144feab49a.pdf>。

家区分开来。很显然，媒体偶尔能损害（或者大大地抬高）政客个人，特别是如果他们一致行动的时候。但是这往往涉及政客被发现有某些严重的不端行为，像尼克松的水门事件——20世纪80年代，媒体竭尽全力地诋毁托尼·本和肯·利文斯通，极有可能玷污了他们，但是没能摧毁他们。我也从未找到媒体内部及由自身发起的运动扳倒政府的例子（不像人民力量那样能够致使政府垮台，从路易十六到胡斯尼·穆巴拉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处于严重危机中的政府，有可能得益于或受制于媒体报道的倾向，而媒体可能在选举中施加重大影响（这一点在下一章节会继续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政党要采取种种办法去逢迎和讨好媒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态度只是众多因素之一（比如经济的状况和政党的声望）。

而且，政要人物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名义上他们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器（军队、法院、行政部门、警察等），实际情况却往往是截然相反。我们能肯定的一件事就是，总的来说媒体更像是国家的仆人而远甚于国家的主人——因为国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

71

大多数时候，统治阶级的不同部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等——虽然名义上互相独立，事实上背地里紧密勾连、沆瀣一气。从默多克丑闻泄露事件中可以对这种勾结窥见一斑：卡梅伦政府、默多克帝国和伦敦市警察局之间紧密联系。但是丑闻也表明了情况不妙的时候，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社会等级和权力等级，而媒体并不处于这个等级结构的顶端。

正如我们看到的，媒体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鞍前马后冲锋陷阵，为其合法性提供系统的重要服务、不断地强化其统治的天然性和必然性，而这让它在拥有绝对的经济实力背景下更好地挥舞拳头。“新闻集团”排在上面引用的《金融时报》排行榜第171名，但是很显然它比排在169名的“梯瓦制药”和排在170名“大都会人寿保险”更有实力、政治分量更重。然而，如果一部分媒体的行为——同样的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既有BBC和档案事件的那种方式，也有默多克丑闻的那种方式——开始破坏这种合法性，然后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守护者，就会履行职责干涉调停以遏制局面。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我们？

72 我们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中。几乎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台电视，而电视每天覆盖4,400万人，每周以平均26小时的时长覆盖5,400万人。¹报纸的读者数量也居高不下——《太阳报》每天卖300万份，《每日邮报》200万份，《每日镜报》120万份。²我们每天都听到人们谈论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或者在报纸里读到的，经常不加辨别地重复这些内容。

1845年，在任何现代大众传播媒体悄然出现之前（那时最畅销的报纸是大概每周发行8万份的《伦敦新闻画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³

今日媒体巨大的影响，就像它经常被谈及的，只不过是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支配地位或者霸权地位这一普遍事实的主要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和之前的几个世纪，教会是意识形态统治的主要手段。今天电视节目主持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神父——尽管神父仍然在起作用，还有从幼儿园到大学也是很重要的教育系统。

但是，即使对马克思自己而言，“统治社会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也是统治社会精神的力量”的说法也不会是其理论的全部，否则，这个说法会使他一生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即其认为工人阶级可以从统治思想中解放自身的信念。他在《共产党宣言》中

1 资料来源：Figures taken from the Broadcasters' Audience Research Board, http://www.barb.co.uk/report/weeklyViewing?_s=4。

2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newspapers_in_the_United_Kingdom_by_circulation#Circulation_in_the_2000s。

3 资料来源：<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german-ideology/ch01b.htm>。

写道，“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独立的运动”。

因此，我们都完全被媒体洗脑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落空了，因为我们的情况是，如果我没能写这本小册子，而作为读者的你，不会正在读它，很显然你我不可能是唯一“逃离”的人。更重要的是，大量证据证明，有时很多人不接受媒体向他们宣传的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在序言中，我引用了大量反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例子，尽管媒体压倒性支持（主要的大报只有《每日镜报》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而且也只坚持反对到战争开始而已）。

从一个更世俗的层面来看，在报纸的政治立场和读者的实际投票行为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方面有很多迹象可循。

《每日快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3	69	67
保守党	68	49	43	48	53
工党	15	29	33	28	19
自由民主党	15	16	19	18	18
其他	2	6	5	6	10
保守党领先	+53	+20	+10	+20	+34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6.5	+5.0	-5.0	-7.0

《每日邮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5	69	73
保守党	65	49	55	57	59
工党	14	29	24	22	16
自由民主党	18	14	17	14	16
其他	3	8	4	7	9
保守党领先	+51	+20	+31	+35	+43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5.5	-5.5	-2.0	-4.0

续表

《每日镜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2	63	68
保守党	20	14	11	11	16
工党	63	72	71	67	59
自由民主党	14	11	13	17	17
其他	3	3	5	5	8
保守党领先	-43	-58	-60	-56	-43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7.5	+1.0	-2.0	-6.5

《每日纪事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57	59	65
保守党	14	12	8	7	12
工党	55	57	59	55	65
自由民主党	7	10	10	16	6
其他	24	21	23	22	17
保守党领先	-41	-45	-51	-48	-53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2.0	+3.0	-1.5	+2.5

75

《每日电讯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71	77	81
保守党	72	57	65	65	70
工党	11	20	16	13	7
自由民主党	16	17	14	17	18
其他	1	6	5	5	5
保守党领先	+61	+37	+49	+52	+63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2.0	-6.0	-1.5	-5.5

续表

《金融时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 样本太小以至于不能提供有力的测算)			64	65	*
保守党	65	48	48	47	
工党	17	29	30	29	
自由民主党	16	19	21	21	
其他	2	4	1	3	
保守党领先	+48	+19	+18	+18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4.5	+0.5	0.0	

《卫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8	73	78
保守党	15	8	6	7	9
工党	55	67	52	43	46
自由民主党	25	22	34	41	37
其他	5	3	8	9	8
保守党领先	-40	-59	-46	-36	-37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9.5	-6.5	-5.0	+0.5

《独立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9	76	79
保守党	25	16	12	13	14
工党	37	47	38	34	32
自由民主党	35	30	44	44	44

续表

《独立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其他	3	7	6	9	10
保守党领先	-12	-31	-26	-21	-18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9.5	-2.5	-2.5	-1.5

《每日星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48	46	43
保守党	32	17	21	21	22
工党	53	66	56	54	35
自由民主党	12	12	17	15	20
其他	3	5	6	10	23
保守党领先	-21	-49	-35	-33	-13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4.0	-7.0	-1.0	-10.0

《太阳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50	52	57
保守党	45	30	29	33	43
工党	36	52	52	45	28
自由民主党	15	12	11	12	18
其他	4	6	8	10	11
保守党领先	+9	-22	-23	-12	+15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5.5	+0.5	-5.5	-13.5

《泰晤士报》	1992	1997	2001	2005	2010
	%	%	%	%	%
估计投票率			66	71	80
保守党	64	42	40	38	49
工党	15	28	28	27	22
自由民主党	19	25	26	28	24
其他	2	5	6	7	5
保守党领先	+49	+14	+12	+11	+27
保守党 - 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		+17.5	+1.0	+0.5	-8.0

来源：益普索·莫利调查机构大选总集¹

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些情况。首先，大多数鲜明而坚定的右翼报纸的读者，即《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们，2010年投票给保守党，而且几乎总是这样做。但因为保守党选民选择读那些报纸的可能性至少与因为他们受报纸的影响而为的可能性同样多，还有可能更多。然而，甚至就相当偏激的《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来说，也有引人注目的少数派选择工党和自由民主党——《每日快报》2010年有37%而在工党大胜利的1997年有45%，《每日邮报》2010年有32%而1997年有37%。这表明甚至是这些非常右倾的报纸的读者也受到可能所谓国家“政治气候”的影响。

《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之间的对比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同属于“新闻集团”和默多克，基本上踩着同样的政治路线——一般来说居中偏右、在2010年倾向保守党——尽管《太阳报》自然更加亲民得多。然而，2010年22%的《泰晤士报》读者投票给工党（加上24%自由民主党），同时28%的《太阳报》读者投票给工党，加上18%投给自由民主党，这些票数和投给“其他政党”的票数加起来意味着有57%选民没有按其报纸建议的那样去投票。《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之间数据的区别肯定与读者普遍的社会阶级地位相关。我们应该注意到，在1997年和2001年《太阳报》支持布莱尔和新工党的时候，52%的读者也这么做，这隐含着重大影响，但也有可能是报纸在某种程度上跟随它的读者的个案。

《每日星报》也颇有意思。它是最“低档廉价”和“蹩脚”的小报，提供最少的

1 资料来源：<http://www.ipsos-mori.com/researchpublications/researcharchive/2476/Voting-by-Newspaper-Readership-19922010.aspx?view=wide>。

政治新闻报道且发行量最低（意味着大多数工人阶级需要更好的东西）。它的老板是理查德·德斯蒙德，他也拥有《每日快报》（长期以来以反移民、反寻求庇护者的故事为特色）。2011年2月《每日星报》比其他全国性报纸更加右倾，刊登基本赞同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保卫英国联盟”的头版文章，并且以值得高度怀疑的声明结束报道，“在《每日星报》昨日的电话民调中，98%读者说他们同意‘保卫英国联盟’的政策”¹。然而以上的益普索数据显示，在所有投票的《每日星报》读者中，工党已经持续得票最高而在2010年也是如此，尽管它的票数减少到35%，而可能包含“英国国家党”在内（接近于“保卫英国联盟”）的“其他”项票数已经上升为23%。

79 总的来说，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报纸不能轻易操纵读者的政见。它们确实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但那种影响是动过手脚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被其阶级立场和阶级忠诚抵消掉。事实上，尽管布莱尔竭尽全力，工党仍然被广泛地视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右翼小报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续给工党投票，还解释了为什么像在支持工党的《每日镜报》那样政治和阶级相辅相成的地盘，工党的票数是可观的——1997年是72%而2010年是59%。

这反过来得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媒体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由多种因素塑造，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统治阶级下达的世界观（通过媒体、教育系统、政治家、教会等——重要性可能按照这个顺序）和自身的社会经验。一般来说这两种力量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拉扯而产生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谓的“对立的意识”——他们相信理论上的利益动机但认为他们的老板是一个贪婪的家伙，他们是爱国的并“信任国家的”但实际上想移居他国等。

由此断定，媒体的影响力将会依据事件和环境而起伏不定。当应对直接个人经验的事件时它将趋于最弱，当应对人们没有或者不会有相关经验的事件或过程时它趋于最强。

80 以大量失业的问题为例可窥见一斑。太多人有过直接的或者通过亲朋好友得来的有关失业的个人经历以至于不能把它转变成一件好事，即使统治阶级确实有些时候，就像保守党的财务大臣诺曼·拉蒙特1991年所说的，认为它是“很值得支付的代价”。因此，所有的公众人物，还有媒体，别无选择地像对待灾难一样对待失业，甚至当他们事实上正在解雇大量人手或者正在推行必然加剧失业的经济政策时也是如此。失业的潜在原因则另当别论，这通常无法直接感知而是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迷宫内。因此到了追究失业责任时，媒体和政治家们有很多空间移花接木，如将移民、黑人、寻求庇护者或者临时充当替罪羊的任何人作为造成失业的根源。

1 资料来源：<http://www.guardian.co.uk/media/greenslade/2011/feb/10/dailystar-english-defence-league>。

与此相反，很少（英国人）有寻求庇护者的亲身经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们。于是乎，给寻求庇护者编造没完没了的故事是有可能的，一周领500英镑，由“我们”出钱在奢侈的酒店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或者跳到申请住房的队伍前面的同时“抢了我们的饭碗”——而且，至关重要的，相当多的人相信了这些故事。将孤立事件渲染为典型事件的手法，如果定期为之则可制造一个完整的假象。

同一情况的另一个例子，是地方性报纸和全国性报纸的风格和基调不一样。地方性报纸比全国性报纸更少地偏向攻击、羞辱和侵犯其社区成员的隐私。这是因为受害者个人有可能就是很多读者熟悉的人，然而到了全国范围内认识当事人的读者寥寥无几，因此全国性报纸可以无所顾忌地随意攻击。

当事件超出人们的直接经验时，他们接触到不同信息源的程度将产生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说，当读者读到有关阿富汗的单篇报道或同一事件的系列报道时，尽管他们意识到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观点，他们也更容易相信所读到的内容。而如果他们是分享一种“反对的”观点的团队、组织或者社区的成员，那么他们极可能接触到这样一些不同的信息源。从W.L.米勒1987年大选的媒体研究中可得出结论：

媒体只为读者中的一部分人设置议程：那些高度依赖特殊新闻来源的人，那些较少接触政治参与和政治信息的人，和那些通常相对不关注政治的人——一句话，就是政治的边缘人群。¹

81

同样地，大卫·莫利关于不同群体解读英国广播公司BBC全国新闻时事节目的方式的研究报告认为：

正是（工会）工厂工人代表自发地对节目进行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最充分的反向解读。他们拒绝节目告诉我们“我们抱怨”什么并试图建构国家的“我们”。这个小组完全符合反向解读的标准，准确地说，它重新定义了节目所呈现的事件。小组成员对他们所看到的诸如在经济学讨论中明显缺失的情况持批判态度。²

所有这些对于资本主义媒体的影响处在最弱的情形时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它可能是人数可观的大众在大规模的示威抑或罢工中被卷入直接的行动或者斗争的时候。

1 资料来源：W L Miller, *Media and the Voters: The Audience, Content and Influence of the Press and TV at the 1987 General Election* (Oxford, 1991), pp. 164-165。

2 资料来源：D Morley,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1988), p.117。

在这些条件下，数百万人的直接经验，他们的亲力亲为，将会是新闻故事。如果媒体拒绝报道斗争，它们将注意到它并且得出结论；同样地，如果媒体妄图曲解篡改抗议者或者罢工者的议题和行为，它们也会如此。斗争中的大众也必定是小组的、网络的、组织的一部分，这些场合提供其他信息，还会发出并且支持反对性的观点。

关注列夫·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定义在这儿是有帮助的：

82

一种革命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群众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论是君主的还是民主的——总在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创造。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会打破将他们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壁垒，撇开他们的传统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创造新政权的初步基础。¹

在示威游行中，无论什么时候爆发暴力冲突，无论什么时候人们与警察斗争，所有资本主义媒体的例行做法就是一味责备、无情抨击游行示威者们，如：1968年格罗夫纳广场反越战游行，1989年人头税暴乱，1994年威灵“反纳粹联盟”与警察对峙，还有2010年11月的学生示威游行，等等。

总而言之，大众传媒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特别是当大多数人处于被动的时候，但它绝不是万能的。它的影响力波动取决于所涉及事件还有如何与人们的亲身经历相关联。当它遭遇大规模抵抗时，媒体的影响力最弱。

1 资料来源：Leon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77), p.17。

与媒体斗争

83

毋庸讳言，从这本小册子到目前为止写的一切事情来看，任何想看到真正的社会改变的人都必须有应对媒体的策略。本章我想着眼于这样的策略中的五个因素：(a) 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过招；(b) 利用资本主义的媒体；(c) 脸书、推特和所有新媒体；(d) 群众运动；(e) 政治组织。我将按顺序逐一讨论这些因素，但它们本来就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它们或多或少地总是需要根据情形变换重点。

但我想一开始就排除三点：一是仅仅联合媒体本身和以自己的方式就有可能实现变革；二是通过议会立法，媒体就能发生实质性的变革或者保持中立；三是停止读报和关掉电视，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大规模排斥媒体。

如果你是一名主流的职业政客，有志于促进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那么成为“媒体达人”、学会如何在帕克斯曼的访谈或者在《提问时间》的节目中表现自如、获取焦点小组的建议去找出什么样的简短引述和哪一款发型在《六点新闻》中受欢迎、了解如何获得植入报纸中的故事、获得报社编辑的电话号码或者最好是去同他们共进晚餐，所有这些可能都非常管用。如果你涉及激进运动——工会会员或者学生激进分子，反抗裁减计划、保卫一所医院、同种族主义或参战作斗争——这些技能中的一些可能也迟早会派上用场，尽管你将用到它们的机会要少得多，尤其是同《每日邮报》的编辑共进晚餐。

但指望这样的方法能提供一套媒体或者社会变革的战略或方法就大错特错了。个人之力或者激进运动在媒体上的影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奏效，但是不能改变或者说真正转换它根深蒂固的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和普遍的右翼角色。走得太远，或者不加鉴别地频频亮相的话，这一套抛头露脸的方法有可能导致屈服于媒体——内化和接纳它的标准和价值——因此削弱或者放弃了运动或组织的目标。

84

新工党的媒体战略就是一个玩过了火的极端案例。它用的是全方位的手段：在低层对记者恐吓威胁（尤其是布莱尔的新闻秘书——阿拉斯泰尔·坎贝尔部署操作）和在高层由布莱尔亲自出马对默多克及其他人阿谀奉承、软硬兼施。这一套战略在巩固有利的媒体报道方面被玩得出神入化，而这样一来它帮助布莱尔赢得了选举，但作为交易的条件一直都是这样：工党丢掉了以任何方式威胁资本主义的任何政策。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任何相对较小规模的运动。试想一下，举例来说，你是一名代表着委屈叫冤的工人小组的工会委员，假设你受到了减薪的威胁，与媒体套近乎的种种技巧可能有所帮助，但如果那变成了主要战略，它就会危害工人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媒体实质上总是反对罢工或者激进的工人行动，无论工会官员有可能非常上镜或者非常精通媒体。

85 有时，特别是当媒体行为的丑闻曝光时，约束媒体行为、限制侵犯隐私的立法呼声就会高涨。新闻发言人则一成不变地抛出抗议言论，说这样的法律只会有助于限制新闻自由和保护进行肮脏交易的政客免于新闻追踪而已。这些案例中的问题基本上是：双方都不遗余力地揭露对方的真面目却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罪行。换句话说，媒体经常以应该被制止的方式表现得令人失望，但是试图达到这种目的的法律将被用来妨碍或者阻止调查性新闻并保护政客和其他的高层。但无论哪种方式，它都解决不了主要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由议会制定的法律会挑战或者能够挑战根本的资本主义控制，因此大部分媒体是资本主义倾向。

如果目标是改变社会的话，拒绝与媒体过招也不实际。正如我们看到的，宣传的艺术并非仅关于世界的谎言。它在于半真半假、虚实混合，以这样一种方式让观众和读者难以分辨。甚至在最蹩脚的小报中也有大量的信息确实是真实的：报纸的日期千真万确；电视节目列表准确无误；体育比赛的结果正确无疑。如果《太阳报》报道女王去世了或者首相辞职了，那会是真的——因为若是谎言它将太容易被揭穿。电视新闻，或像《金融时报》或《卫报》那样大张宽幅、稳重严肃的报纸，不乏大量关于这个世界既真实又有益的信息。要进行变革世界或者呈现世界之与众不同的尝试，无法置身于这种信息之外。任何“替代的”“独立的”或者激进的力量来源，也无法与大公司集团和国家广播公司的金融、技术、政治力量来源相匹敌，直到社会秩序被改变。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在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媒体，同样地，除非资本主义被推翻，否则在资本主义商店购物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斗争

“我个人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保证一种理智自卫的过程，以保护自己免受操纵和控制”（诺曼·乔姆斯基）。¹我们所有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读懂违背事实的媒体：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有可能吐露真相，什么时候有可能谎话连篇；能够从纷纭的意见中甄别是非；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种种主张意图何在，即它们代表着什么偏见、立场和利益；能够理解为什么特定的报纸或新闻公报中特定的新闻取舍是按照已有套路来部署编排的。

86

这其中的部分问题的关键是弄明白媒体有规律地使用的特殊伎俩。例如，那些节目或者报纸的看法事实上是向一般公众或者特定个人发布的，然后作为事实进行报道：“昨天一场关于X的暴风雨爆发了”，或者，“昨晚在威斯敏斯特有Y暴行”。在很多情况下，在公众中根本没有“暴风雨”和“暴行”，尤其是甚至在事件或问题被报道之前，且经常也是在它已经被报道之后——不如说“暴风雨”只是由记者杜撰的。当“暴风雨”被来自政客或公众人物的引述夸大其词或者作为例子时，就有必要警觉这样的人最有可能是媒体特意打电话安排的。的确有一些政客因“引述得当”而颇负盛名。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用语的影射作用：罢工时期总是“失去”而非“获得”，始终不变地导致“毁坏”或给公众带来“不便”，罢工者从不被看作“公众的一员”。解读“极端”和“温和”的用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听到或者读到一篇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冲突的报道，尤其是你一无所知的某些地方——蒙古或者巴拉圭——还有某一派别、政党或者领导被形容为“温和”而其他人被称为“极端”，你马上明白：（a）我们的政府站在哪一边；（b）你被指望站在哪一边。如果在工会中出现同样的字眼，这一套同样通行。

87

最明显的媒体误导用语的例子一列就是一长串：警察“粗鲁地”对待“暴力的”抗议者但是警察从来都不是“暴力的”；“我们的”士兵始终如一如何“勇敢”而敌人/

1 资料来源：Noam Chomsky, *Necessary Illusions* (London, 1989), p.viii。

88 恐怖分子总是如何“懦弱”；政客裁减教育经费或者社会福利是如何进行“困难的抉择”和做出“艰难的决定”，但是每一个人，且不说恐怖分子，都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那儿“不得不裁减”等。它不只是用语的问题：有必要弄清楚照相机最有可能撒谎，镜头角度可以让空着一半的会场看起来满满当当，或者一小群人看起来像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公报板上新闻条目的排放顺序也影响着读者的感觉，而本无关联的事情（如在火灾、旱涝、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之间）也能变得恰好有所关联那样地重要。

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与媒体斗争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识破它们的诡计和还原它们的用语，它还包括接触不一样的信息源和观点，还意味着最终培养一种不一样的世界观。

总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信息源：书本、图书馆、激进杂志和报纸——从马克思和乔姆斯基的学术大部头，还有像《新左派评论》或者《国际社会主义》这样的杂志，到像《社会主义工人》那样在街上售卖的流行小册子和报纸的任何来源。当然接触到这样的信息源颇费周折——比BBC播报的或者装在盘子里端上来的《太阳报》这些唾手可得新闻要费劲，比为很多忙于生计的人准备好了投其所好的内容要费劲；虽然如此，需要批判解读媒体的信息大体上就在那里。毫无疑问互联网带来了不少便利，尤其是在可以全球性获取信息方面。只要轻点几下鼠标我就能找到发生在希腊、埃及或者澳大利亚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否BBC或者我的报纸已经有所选择地屏蔽掉了今日世界的那一部分信息，我也可以接触到基本的事实信息——日期、统计数据等——非常便利，我还可以通过种类繁多的博客选摘一系列观点。而且，如果我准备追根溯源，网络上的调研资料极其充足可以随意调用。

89 然而，互联网也加剧了已经存在的问题：信息泛滥、过犹不及。一本书在图书馆上架之前，它至少经过了几重质量控制的过滤关卡。互联网的海量资料就不一样了。因此，个人如何在互联网提供的大量信息和观点中拎出主线、辨明真伪？解决之道有两个：一是，单打独斗是很困难的，如果通过分享信息和观点的小组、社区或者组织等团体共同努力的话，效果要好得多（我会回到这一点）；二是，它需要培养不一样的世界观，或提供一种多少对世界连贯的理解和一种让各种特定事实和故事能在其中定位的框架理论。这样至少有可能屏蔽掉大量废话。

符合这一理论需要的例子在当下很盛行，我们一般称之为“阴谋论”。“阴谋论”的主要特征有：（a）声称世界由极少数的人操纵，这些人团结起来或多或少地控制着发生的任何事情；（b）这种阴谋论的知识既深藏不露又广为人知，当然包括与之相关的阴谋家也是如此。这些主张大错特错，使人误入歧途。

诚然如此，英国、美国等一些国家由少数人控制，而且这一小部分人非富即贵。

但事实不可能是他们仅为一小撮神秘个人。没有现代社会、甚至没有政权能够由一小撮人掌管，即使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也不能——有必要让成千上万人组成整个层级或者社会阶级，因为他们不仅要能够控制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而且要能够控制主要的经济生产过程，如工厂、矿山、商店、公司等场所。其次，统治阶级不是由神秘操纵的等级组织起来的，而是由共同的既定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本质上是靠获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利润份额。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但当对抗我们其余的人时，这些统治者发现他们的联合体被无数冲突、矛盾所破坏、瓦解而断层：美国对中国，英国石油公司（BP）对壳牌，特斯科（TSCO）对赛恩思伯里（Sainsbury），《每日邮报》对《每日快报》，甚至到个人之间的竞争，他们持续面临种种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人民的从下到上的反抗。结果，虽然他们支配世界且大多数时候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但这些统治者绝不可能控制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实际上，历史是由相互冲突的合力而非单个意志或力量产生的结果。了解世界与应对媒体所需要的，不是隐藏着的某些秘密阴谋，而是对这些力量及其驱动原因的现实分析。

90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最持久和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它代替了垄断主流媒体的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成了读懂自相矛盾的媒体最有效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不是阴谋论而是阶级斗争理论。它认为任何社会的建立取决于它组织生产的方式——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基础。今天，资本主义将人们分为靠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生活的人（包括诸如教师和当地政府部门工人等所谓白领工人的工人阶级）、靠从工人劳动中攫取利润的人（形成统治阶级的资本家或者雇主），以及他们之间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这些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统治阶级由互相熟知并时不时打交道的现实人群组成，但是驱使和约束他们的是竞争性的利润追逐。

91

主流媒体从这些统治者的角度呈现世界（即使在它使用工人阶级的口吻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则从相反的角度分析世界，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看问题，从而为它的批判奠定了良好基础。

利用资本主义媒体

我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在讲述我们如何自己与媒体作斗争，但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挑战媒体的一般社会影响力。我已经声明了反对以自己的方式与媒体合作，但那不意味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应利用它。只要我们别忘了主流媒体是敌人的地盘，别纵容媒体主宰我们行动的绥靖策略，以不同的方式干涉媒体对于想变革的人们来说则是非常必要的。

利用媒体的方法很多，从非常简单地给报纸写信（一般比给首相或者部长写信更有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到代表运动发布新闻稿、接受关于游行示威的采访、还有在观众前露脸或者出席谈话节目的小组。所有这些行动都会奏效，当然也是被广泛采取的方式，但应该注意到这些机会对于激进派来说可能作用相当有限。还应该注意到，除了简单地写信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采取且依赖于集体的政治组织的某种形式。

92 当谈论到利用资本主义媒体时，有必要记住媒体生产者，像这个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车间、公司或者机构，都采用一种基本组织原则，即从老板和高管的顶层到看门人、清洁工的底层延伸的阶级等级制度。这里重要的是大多数在报社、电视台、电台等地方工作的人都是工人阶级，他们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与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或工厂工人一样被雇主剥削。这包括记者中的大多数，不是全部，当然一些人晋升后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全国记者工会”是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有时候会出现相当左倾的总书记。

这就意味着对某些人来说成为报社或电台里的左翼记者是完全有可能的，从而对媒体的整体舆论导向施加一些影响。这多半发生在食物链的相当底层，屈服于各种各样的助理编辑、编辑、制作人等的控制。然而也有屈指可数的记者例外，他们部分因能力出色而在事业上步步高升、声名鹊起，同时坚持他们的原则和批判精神：保罗·福特，约翰·皮尔格，埃蒙·麦卡恩和罗伯特·菲斯特都是榜样。同时媒体界也有在另一条线上肩并肩奋斗的类似人物，如从事电影制作的肯·洛奇，迈克尔·摩尔或者从事电视喜剧的马克·托马斯和马克·斯蒂尔。但是，不可避免地，靠这样势单力薄的少数个体无法改变全部媒体的资本主义性质，对于每一位这些有原则的人来

说，还有其他一些人，像克里斯多夫·希钦斯或者朱莉·伯奇尔，当他们小有名气之后，或者为了沽名钓誉、财运亨通，他们就改弦更张了。

这也意味着媒体工作者有可能在自己的工资和条件之外的问题上进行集体行动。1972年，希斯保守党政府因罢工纠察拘留了五名码头工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本顿维尔五”事件。码头工人转而去寻求印刷工人的支持，而整条旗舰街（所有的全国性报纸）团结一致关门停工——这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为由“英国总工会”召集的但终因政府投降而中止的总罢工创造了环境。在1984年到1985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中，《太阳报》企图发布头版声称会曝光矿工领袖，亚瑟·斯卡吉尔，行纳粹礼（事实上他只是向某人打招呼），还辅以标题《我的元首》呼应配合。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直接拒绝排版，而《太阳报》发行时“开了天窗”。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上述一些记者的支持下，一个名为“反对战争的媒体人”的组织建立了，它总体上对反战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媒体工作者的这种斗争相对罕见，它往往发生在更大的阶级斗争和运动的环境中——我回头会说这一点。

93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考虑到脸书和推特已经铺天盖地得到大肆宣扬——它们几乎不需要在本书进行赘述彰显其作用，强调它们的局限性更重要。不过我知道有很多仍羞于使用这些技术的左翼人士，因此我想一开始就简要地说：它们就是交流工具，不会使用它们就和刚开始时拒绝使用电话一样，没有太多的区别。

94 而且，一般意义上的互联网，特别是脸书、推特，对于激进者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相对通常所指的电视、报纸、电台、电影等大众媒体，互联网等运作时的去中心化更难控制。取代了只是极少数的人（享有高度特权的）能够向大众发言的工具，它们是大多数人能够互相交流的工具。另外，尽管它们绝不是免费，但相对于创办一份报纸、一家电视台或者电台、甚至打电话的成本来说，使用它们的费用是微乎其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潜在的民主化力量。它们在促进普通人快速地进行互联网交流的方式上尤其有用。正如乔尼·琼斯在他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30期的精彩文章《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中评论的那样：

信息穿越各大洲的速度，部分是由积极分子利用互联网推动的，已经可以使得这样的图片——塔利尔广场的抗议者，四周环绕着埃及旗帜，高举“埃及支持威斯康星州工人”的标语——在全世界传播。¹

另一个说明新技术力量的极佳案例是在 YouTube 视频网站上来自巴塞罗那的“愤怒者”运动。2011年6月15日反裁减抗议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举行。直到那时，运动一直是和平的，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出现了暴力倾向，当然也因此被主流媒体严厉地谴责。然而，抗议者捕捉到了证明暴乱是被潜伏在人群中的警察密探煽动挑起的录像片段。²数小时内，这段视频在 YouTube 视频网站流出并且病毒似地传播蔓延。6月

1 资料来源：<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22&issue=130>。

2 资料来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ZTONyRPId-U>。

19日，星期六，西班牙全国上下有高达数百万人游行支持抗议者。

因此，很明显，最好的物尽其用的方式应该是由所有这些新的交流工具发挥作用，正如它应该由像口头语言和书本这样的老式工具发挥作用一样。但是局限性何在呢？

第一，将2010年的英国学生反抗、西班牙叛乱或者任何其他群众运动归功于这些新技术是错误的，弄得好像它们是事件的原因或者主要因素一样。1789年的法国革命采用的鼓动工具是报纸（马拉的《人民之友》），但它不是“报纸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也是利用报纸，接着在事件发生之后，采用了电影的形式（举例来说有埃森斯泰因的《战舰波将金号》），但它既不是报纸革命也不是电影革命。1968年5月巴黎使用丝网印刷海报，然而它不是“丝网革命”。这样的剧变或者大型的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是推动它的人民及其社会地位状况——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上升的资产阶级及“无套裤汉”，俄国革命中的工人和农民，等等。

第二，尽管脸书、推特和YouTube视频网站经常被称为“社交媒体”，实际上它们像迪士尼、时代华纳或者新闻集团一样属于资本主义媒体。我前面说过它们在运作中相对地去中心化，但是它们在最终占有和控制上不是去中心化的。谷歌公司是美国跨国集团，拥有雇员24,400人，2010年利润为85亿美元，总资产达到578亿美元。脸书由脸书公司私营，部分归高盛投资集团拥有。它有雇员2,000人，2010年估计收入是20亿美元。推特在2006年启动，2010年有450名雇员，预计收入1.4亿美元。YouTube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创立，2006年被谷歌公司以16.5亿美元收购。

这些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公司都通过广告挣钱，如果它们想被审查的话，所有人都可以审查它们制作的产品内容。同样地，它们都会受到国家制裁。对于公司和政府来说，都存在着不这样做的经济动机，但如果到了紧要关头，两者都将会如此这般进行到底。因此，2010年7月谷歌为了更新它的互联网许可证而接受了北京的要求，保证不提供非法信息，想必是因为它不想失去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YouTube不时地多次被摩洛哥、泰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封锁。最引人注目的是埃及在1月25日完全把自己从互联网中抽身出来与世隔绝，力求阻止革命分子的互相联络以及与全世界的联络。

所有这些都表明把社交媒体的作用置于任何促使社会变革的战略中心将会是错误的，但是最后的例子也表明了为什么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第三，事实很简单，这种技术可以从左派的立场出发被用来对抗或者绕过主流媒体的影响，它也可以从右派的立场出发（实际上一直是这样）为了同样的目的被加以运用。对于每一个激进的博客或者网站，都可能有一个右翼博客或者网站。如果抗议

97 的学生活跃在脸书上，“英国国家党”和“英国保卫联盟”也会如此。有胡萨姆·厄尔-哈马拉维和吉吉·易卜拉欣（埃及革命分子和博客），就会有我没有听说过的“萨拉菲教派博客”（萨拉菲是伊斯兰反革命的右派）。如果网络可以连接威斯康星州和塔利尔广场，它也可以连接带有德国新纳粹性质的三K党和带有“英国保卫联盟”性质的安德斯·布雷维克。

目前大家对新媒体的潜力赞不绝口，是因为近年来相对于应激性的运动和右翼运动来说，变革运动总体上在增长；最终，在现实世界发生的而非在虚拟世界发生的事情，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第四，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在线交流而出现，这些苗头对于左派来说很成问题。一方面，在脸书和博客圈出现一种宗派互相攻击和粗鲁侮辱的倾向（完全可以放心，你的鼻子不会挨揍），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另一方面，这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一种文化，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事业和团体在网络空间注册、承诺在事件中出席却没有实际现身，都成为一种取代任何实际行动的坐而论道。

因此，我愿赞同琼尼·琼斯平衡的判断，“网络和社交媒体经常是左派传统上从事的行动主义类型的有益补充。在线行动主义被视为原先这种行动的替代品，它注定是不会成功的。”¹

1 资料来源：<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22&issue=130>。

群众斗争

反对资本主义媒体力量和影响的斗争，不能与更广大的社会变革斗争相割裂。两者的核心都是群众行动，最终都是群众革命行动。目前为止我论述的所有事情都指向这一结论。媒体偏向是它的运营之道，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力量结构的一部分并且是整个社会力量结构的反映。媒体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在群众反抗的时候最薄弱，而大众自己是事件中的、被报道的“新闻”中的行动者。群众斗争的条件也是人们的思想最有可能为另一种世界观开放的条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能使他们解读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媒体的方式。 98

群众斗争让劳动人民感觉到自己的潜在力量——媒体及其余社会力量在通常情况下否定这种潜力——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自信心。有了更强的自信心，他们就会变得眼界开阔、运筹帷幄、敢于创新；偏见和固执荡然无存——在群众斗争中，真正的敌人无处可藏，找替罪羊的花招逐渐露出马脚。

埃及革命还为大众被动员起来时如何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供了绝妙案例。当成百上千人占领一个巨大的广场时，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去哪儿上厕所，不过当成百上千的人中有水管工人和建筑工人时，他们就能搭建起临时公共厕所。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给手机充电，不过人群中有电工和通讯电话工程师，不愁没人能挖开人行道接入地下电缆。

在革命行动中的大众参与使反对资本主义媒体的斗争有可能提高到全新的水平。 99 最好的例证来自1974年—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几乎没有40岁以下的人还知道有葡萄牙革命这样一回事，这充分证明了媒体排斥任何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它始于反对萨拉查和卡埃塔诺长达40年之久的法西斯专政的左翼军事政变，而后转化为一场来自底层的工人和士兵的群众运动，由此可见1936年—1937年西班牙内战以来西欧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最高水平。

在这个小国家里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超过五十万。在工人阶级酒吧里政治议论和争辩紧张激烈……工人们讨论法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的形势，他

们俨然干了一辈子的政治专家。拥护武装暴乱的海报是合法的，甚至公共汽车票上都有政治口号。

国家的指挥官不再依赖它的军队。坦克沿着鹅卵石街道隆隆作响地行进，载满了示威的工人。占领工厂的规模让人们回忆起1936年和1968年的法国……不仅工厂被接管，受欢迎的诊所和文化中心如雨后蘑菇般遍地冒出来。在一家医院里，工人们从修女们手里接管事务，并邀请她们来群众会议投票。¹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托尼·克利夫在那时观察到的，“最重要的工人阶级战争之一——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超越了媒体的控制”²。这包括工人罢工和占领法西斯掌管的《贸易日报》长达5个月之久，从1974年的4月一直持续到8月底。在占领期间，工人们发行了一份罢工报纸，得到了其他的里斯本日报一日总罢工的支持。随后，这份报纸被信息部部长和社会主义党（亲资的）的党魁保罗·雷戈编辑的《共和国报》占领。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在1975年早期接管了天主教堂的“复兴广播”（葡萄牙数一数二的电台），电台被工人阶级掌握在手里。克利夫在那时写下文字形容它的播出为：

电台的节目策划由大会部署，全世界各地的斗争报告定期播送，在工厂、租户委员会等进行的斗争被广泛地倾听。³

当然，随着1975年年底革命的崩溃，葡萄牙恢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这些媒体业务也回到往日，一切照旧。

很显然，媒体控制的斗争有可能成为任何现代革命的关键问题，并且各种类型的创新显然都是有可能的。

1 资料来源：Peter Robinson, “Portugal 1974-75: Popular Power”, in Colin Barker (ed), *Revolutionary Rehearsals* (London, 1987), p.83。

2 资料来源：Tony Cliff, “Portugal at the Crossroads”, in Tony Cliff, *International Struggle and the Marxist Tradition* (London, 2001), p.235.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cliff/works/1975/portugal/3-masses.htm>。

3 资料来源：Cliff, as above, p.237。

政治组织

在与媒体的影响斗争和挑战媒体的力量中，群众斗争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最终，它只靠自己是不够的。大众斗争需要政治组织的辅助和全程陪伴。政治组织，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从工会，到地方性和全国性运动，到羽翼丰满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

目前控制媒体的和媒体基于其阶级利益运作的阶级，在政治上是极有组织性的。首先，它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工具——武装部队、警察队伍、司法部门——所有部门都有极好的机会接近媒体并与媒体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然后它有像CBI英国工业联合会和英国企业董事学会、智库、专业协会等无数的商业协会——所有这些组织都能影响媒体。当然，还有它的政党。在每一个国家，资产阶级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政党提供财力支持，或者毫不含糊地为资产阶级追求利益。在英国，当然它就是保守党；在德国是基督教民主党；在法国是人民运动联盟。在一些国家有两个主要的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劳动人民和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也需要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他们的政治组织在各个层面上反对媒体的斗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101

显然，与其他人联合起来比起单打独斗地与媒体对抗更有效。任何组织、工会或者运动都会是另一种不一样的资源，并能产生和分享它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方面最有效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因为它能够全面地展现一种可替代的信息和视角，而不只是针对单独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的问题。这将依次影响、告知和加强对资本主义媒体的利用程度，从写信到现身电视节目，使用互联网、脸书、推特和整体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他强调统治阶级力量总是“强制和认可，强权和领导权”¹的联合，而且在两个层面都必须进行竞争，同时他也坚持政党展开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君主（参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文中他呼唤一位意大利民族国家的领袖出现）……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复杂的社会要素。在这个社会中，

1 资料来源：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1971), p.170。

集体意志已经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显示威力，开始呈现具体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个有机体，那就是政党。”¹

102 这样的政党的功能之一就是创立自己的媒体和出版机构，它们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国家或阶级，也不依赖广告或赞助，但能提出一个清晰明确、毫不妥协的批判系统。历史上，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政党最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创办一份新闻报纸。让·保罗·马拉的《人民的朋友》堪称模范，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上半叶宪章派的《北极星》和《红色共和》，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新莱茵报》，还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真理报》，葛兰西的《新秩序》，英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日报》（后来的《晨星报》），社会工人党的《社会主义工人》。²

所有这些报纸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努力为了另一种可能选择的世界观而与组织他们的支持者和那些在他们影响下采取行动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这两种任务都必须在多层面上开展工作。对当日主要事件的评论和对统治阶级的胡作非为所进行的颇受欢迎的揭露，必须辅以更广泛的历史和理论文章来补充。通过信件和罢工报道吸引工人们来创办和认同报纸，需要携手致力于会议和示威游行、竞选活动的宣传，统一分歧，以及通过回答“下一步需要干什么？”这一问题来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导。

103 最近，有些评论提出，因为电子媒体的出现，报纸的时代终结了。但是，对此有两个实质性的反驳意见出现。一是很多工人阶级继续读报纸而无法接触到在线资料，二是卖报纸可以与工人、学生和积极分子进行个人亲身的接触和对话，这种方式无法在赛博空间实现。然而，也很明显，当代激进政党都不会只是单独通过它的报纸开展交流联络，而是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现代技术。

我想总结的主要观点就是，这里列出来的五项战略要素需要以这种互相加强的方式结合起来。

1 资料来源：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1971), p.129。

2 克里斯·哈曼在《革命的新闻》中提供了有价值的关于这些报纸和其他激进报纸的历史综述，《国际社会主义》（第24期，1984夏），<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84/xx/revpress.html#top>。

资本主义之后的媒体

预测和详述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体将会如何组织或者将采取什么形式的具体细节是不可能的。这将取决于这样的社会变为现实时所处的环境与享有的技术，还取决于未来的人们的意愿与选择。这两者目前都不可知晓，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写它呢？

首先，因为尖锐地批评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媒体，又因为驳回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质性变革或改革媒体的可能性，似乎我应义不容辞地至少提供一个我乐于视为可选方案并倡议为之努力的宏观脉络。其次，我对一种明显而又标准的右翼反诘形式心知肚明，针对这个论点表示反对的意见是：换句话说，不管莫利纽克斯或者任何其他激进的媒体评论家怎么说，唯一能真正替代由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竞争所支配的媒体的，只会是一种由国家主宰的媒体，这结果会像共产主义俄国一样，是整齐划一的政党或政府宣传。

这一反驳源自于为资本主义辩护和反对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核心论点之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彻底互助共存的，而唯一可能代替“自由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是与官僚压迫和专政联手的国有企业。这反过来时而公开时而隐晦地落脚于一种假设，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地实现民主社会，似乎都是毫无可能的，除了在最有限的意义上每隔四年或五年选举一个议会政府；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民主地控制工业或学校或医院、民主地建立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能力欠缺（这一点现在鲜有公开谈论），而是因为人性被预设为贪婪的和分等级贵贱的（这一点备受议论）。

现在很明显，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们不信这套说辞。与之辩论是一项基础的工作，我虽不能在此一一赘述（我对此已经在别处发表过观点——约翰·莫利纽克斯，《人性是社会主义的障碍吗？》，伦敦，1993），但基本的观点简单明了。第一，考古

学和人类学的证据表明，在超过95%的人类历史中，人类作为采集狩猎者生活在没有利益驱动、没有市场、没有等级的平等社会中，依靠分享收集和狩猎的食物为生。因此认为人类注定或者与生俱来是贪婪、不平等、缺乏民主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验表明，普通人既可以贪得无厌又可以无私奉献，既可以自私自利又可以慷慨团结，既可以奴颜婢膝又可以不屈不挠地坚持他们的民主权力。两种行为模式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哪一种占上风更多地取决于环境和社会条件。采集狩猎的社会条件有利于分享和平等；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则有利于贪婪和（巨大的）不公——对于执政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确使其成为必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将积极鼓励集体、民主、自觉抵制特权和不民主的等级制度。

106 因此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媒体是怎样的？我的意思是指在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下。让我们暂且同意（我稍后将证明这一点）今天的主要媒体集团——默多克帝国、罗瑟米尔报团、天空广播公司、独立电视台等——将采用诸如国有制的公有形式。这将会产生一个公开、民主的媒体吗？这都取决于占有和控制它的国家的性质。

107 依据巴黎劳动人民接管城市政权长达74天的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写于1871年的文章构想了一些民主工人国家的基本原则。首先，他注意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¹；宁可解散旧国家机器代之以自己的。“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²。

公社由城镇各个选区普选产生的市议员组成，实行短期任免制。它的成员中的大多数人自然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融行政和立法于一身的议行合一的工作机关。

代替继续担任中央政府的机构，警察部队立刻被剥夺了其政治属性，变成随时可以任免的公社机构。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也是如此。从公社成员往下，公共服务必须按工人的工资水准发放。国家高级政要们的既得利益和代表津贴也随之消失。

108 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有官员和代表的撤换制，还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参照工人工资发放。这些是为防止追求名利和任何新精英出现而特意设计的措施。我认为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有效，可以作为一个高度民主和平等的后资本主义行政管理的基础。另一个因素来自俄国革命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成员选举主要不是来自于地理划分的选区，而是工人厂区和士兵营区，也就是来自集体组织，这些可以进行辩论的地方和比在议会选区更容易召集选举集会的地方。这些创新大大加强了罢免原

1 资料来源：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London, 1974), p.206。

2 资料来源：Karl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London, 1974), p.209。

则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在本书的前面，我提出BBC不是中立国家的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因此是坚定地支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但是与私营媒体如福克斯新闻、默多克新闻或《每日快报》相比，当然毫不逊色，而且它的言行不容置疑地更为民主和多元。因此没理由说在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共服务媒体不应办得比这更好。

当然必须会有一些限制。目前在英国公开煽动的种族仇恨是不被媒体和社会容纳的（这不意味着没有大量策划的或者秘密的煽动）。举例来说，我不相信种族主义会被新社会的媒体所容纳。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些限制会比现在更严格，因为新社会非常需要团结，不能容忍种族或民族或宗教阵线派别的分裂。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辩论不会发生。在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中，可能有必要禁止煽动反革命，尤其是如果新社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干涉或者企图暴力复辟的威胁时。但我认为长此以往就没有必要如此了，因为一旦新社会牢固建立起来，尤其是当它变成全球性的事情时，人们提倡回到过去的做法会徒劳无益也无关痛痒，就像现在的人们不想恢复封建社会和中世纪的浪漫一样。即使是这些受限制的媒体，事实上也会比完全被亿万富翁控制的媒体更自由。

109

同样，尽管中央媒体渠道会被公开占有，它们也将会被无数独立的小型合资企业伴随和包围着，这些企业由社区团体、工会、学生联盟、老弱协会、政党、集体、各种各样的个人组织起来，是获得援助或者是自筹经费的。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大多数拥有技术优良（因为有更雄厚的资金投入）、广告优厚等优越条件的媒体来说，这些媒体已经存在，只是“独立性”处于劣势。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将会制造更高水准的竞技场。而且，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新传播技术，比20世纪占优势的技术（出版、电影、电台和电视）更具交互性，这样无形中是有利于民主的。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社会，需要积极地鼓励政治参与，而积极参与决策制定将会在社交媒体中找到有用的工具。

目前，大多数劳动人民极不喜欢“政治”，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话语和想法总是被忽略——这些不能改变什么。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种异化使许多人看待媒体，比起把它当作为了信息、新闻或论辩的手段来说，更多的是为了娱乐。如果普通人积极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制定——我们是否应聚焦于盖学校和医院而不是宾馆？目前托儿所或中小学教育是否应优先？我们需要有轨电车或公共汽车或新地铁线等吗？——这将改变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从而改变他们对媒体的态度。

110

长远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建立将会使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克服某种异化，这种异化滋生了当下媒体的一些丑陋特征。我认为这意味着，《太阳报》《星报》低俗肮脏的哗众取宠、OK! Hello! 的名人崇拜、《老大哥》的窥探欲望、

《英国偶像》的白日梦，这些特征都会逐渐改变直至消失殆尽。

正如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媒体的斗争不能与更广泛的变革社会斗争隔离一样，创建新的媒体将会是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考虑到这项事业的成功，我们不能高质量地创造一个大众的、民主的、真实的、互动的媒体是没有理由的，这种媒体将会与我们目前看到的媒体泾渭分明、迥然不同。

默多克丑闻——他们的媒体和我们的媒体

有那么一刻，某个单一事件，犹如闪电一样照亮天空，揭露了过去一直隐藏在黑暗下面的整个景象。《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丑闻就是这样的事件，它吞没了默多克和他的整个“新闻集团”的媒体帝国。其揭露的真相是多么惊人！

我们生活在世界各地由人群中少数人控制和掌管的社会里。这些掌权的少数人并非一小撮，不是一些阴谋委员会，而是由非常富有的人组成的特定社会阶级，实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大将军、法官、警务局长等——他们合起来在人群中大概占1%、最多2%。

这个阶级，在追逐利润、剥削工人、捍卫资本主义上有着共同利益，他们利用工人并且定义资本，通过分工来掩盖其统治，将其成员分布到声称彼此互相独立的各种机构中去。

法官是独立的，警察是独立的，政客是独立的，国家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或者爱尔兰广播公司）是独立的，公务员是独立的，报社编辑是独立的，由独立的法官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是独立的。除了政客，他们都不涉及政治的。

此外，他们都彼此制约、互相制衡，所以没有某个个人集团或派别获得过多的权力，一切都是公平和民主的。

电话窃听事件所揭露的，是彼此连接的阴暗世界，在现实中将所有这些机构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世界——关键的当权派人物几乎没有遮羞布来掩盖他们的耻辱。“暴君，伪君子，骗子！”正如帕特里克·皮尔斯描述上一代英国统治阶级时所说的。

正如下面的时间表所显示的，丑闻的核心仅仅是为默多克效劳的记者们习以为常

地非法窃听公众的电话。他们监听皇室家庭成员被发现，由此丑闻事件东窗事发。他们窃取被谋杀的受害儿童米莉·道勒的电话记录，这件事浮出水面时，世界炸开了锅——那太可怕了，以至于他们不能编造或掩盖事实。

然而，在丑闻还未揭晓时，很显然他们都是团结一致的——英国高层政客、高层警察和高层媒体制片人。他们有着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交往。卡梅伦和默多克进行过无数次私人会晤，两人是邻居和朋友，他们都互相保护，像极了美国政府保护它的傀儡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样子，直到最后一刻，完全不顾及任何道德或体面的考虑。

我们必须明白，这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系统的的确确就是这样运作的。在爱尔兰，查理·豪伊由于窃听丑闻而辞职，此事件与本·邓恩和“银行家学会会员”有着收买关系。伯蒂·埃亨与豪伊同样深陷其中，就像布赖恩·科恩与纳·菲次帕特里克、迈克尔·劳里与丹尼斯·奥布赖恩，这些人与托尼·奥赖利一起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媒体。

113 像大卫·麦克威廉斯等一些评论员，称这种现象为“裙带资本主义”，并非“真实的”资本主义。事实并非如此。它是资本主义如何在从西到东的现实世界中运作的。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同样和默多克有联系。乔治·布什和迪克·切尼都涉足石油行业。

资本主义显示出腐败就像运动员出汗一样，原因很简单，它是一个自始至终受利益驱使的系统，它不只是受堕落的个体统治，而且是受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统治，在此基础上，这个阶级占据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

与此同时，该丑闻同样表现出我们的统治者并非法力无边。他们被自己群体中的矛盾和对抗所包围并且惧怕民众。面对或明或暗的反抗，他们阵前撤退、丢卒保帅，比如库尔森和布鲁克斯。面临严重的叛乱或革命，像在埃及发生的情形，他们甚至会牺牲最顶层的人来挽救现政府。但他们是可以被打败的。

每一次对腐败的打击都会令我们向前迈进一步，而最终，正是作为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才是我们必须连根拔起的毒瘤。正因为如此，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者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这是因为，主流媒体不仅是自私的、欺诈的和腐败的，而且是系统化地助长了有利于资本家的世界观——一种完全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为利润而组织生产的观念，认为“市场”必须保持良好态势的观念，以及认为“企业家”，即资本家，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的观念。

我们需要一种像《社会主义工人》那样的报纸，它报告和反映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在这和其他国家举行的罢工、示威、运动、起义——这是爱尔兰广播公司

和《先驱晚报》绝不敢采用的方式。

但比起只是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报纸必须做得更多。它同样必须去培育和传播一种不同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它必须不仅揭露资本主义的邪恶而且还要阐明该制度是怎么运作的。它必须对抗分化工人运动的反动观点，例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症，以及支持受压迫者，例如移民和难民，这些资本主义媒体喜欢拿来当替罪羊的群体。

114

它必须作为工人阶级的记忆，为保留我们阶级过去的斗争历史而服务，例如巴黎公社、都柏林封锁、俄国革命以及爱尔兰独立战争中的工人委员会——一段如果不这么做就被忽视和忘却的历史。它必须用政治争论武装读者来与政客们的宣传对峙，为社会主义的选择作准备。

它同样必须扮演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的角色，把工人团体联合起来，在每条战线上团结一致、抵抗统治集团。最后，它必须扮演一种脚手架的角色，在这样的脚手架中一个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得以构筑并成长。

当然，其他的媒体——脸书、推特、YouTube、电影等——所有都能够且应该为这些目标而发挥作用，但是报纸仍然是关键，因为卖报的方式确保了社会主义者同工人运动的互动，还有同其他工人面对面的交流。

丑闻事件时间表

2000年——《世界新闻报》编辑贝丽卡·布鲁克斯发起了抵制恋童癖和供公众查阅的性侵犯者登记册（在8岁的萨拉·佩恩被杀害事件发生之后被称为“沙拉法则”）。

2002年——女孩米莉·道勒被谋杀。

2003年——布鲁克斯转任《太阳报》主编，安迪·库尔森成为《世界新闻报》的主编。布鲁克斯向一位议员承认它曾向警察买过信息，新闻国际公司说这“不是公司的做法”。

115 2005年——在拦截到的电话信息的基础上，《世界新闻报》发布了威廉王子膝盖受伤的故事。此举遭到皇室官员控诉，警察介入调查。

2006年—2007年——《世界新闻报》的皇家编辑克莱夫·古德曼和私家侦探格伦·穆凯尔因为窃听皇室电话被拘捕，认罪后，分别被判以4个月和6个月的监禁。安迪·库尔森辞去编辑职务，但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2007年5月——库尔森成为戴维·卡梅伦领导下的保守党的通讯总监。

2008年——新闻国际公司支付给“职业球员协会”的戈登·泰勒700,000英镑来解决电话窃听的索赔问题。

2009年——布鲁克斯成为新闻国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尔森2003至2007年任主编期间发生过《世界新闻报》中熟悉高级职员的记者窃听名人和政客电话的事件，而报社曾花了超过100万英镑来解决窃听事件。苏格兰场（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宣布不会对指控开展新的调查。

《世界新闻报》的编辑科林·麦乐、库尔森（又一次）和莱斯·辛顿（道琼斯股票的主席和默多克的得力助手）都否认除了法院判决的案件外的电话窃听证据。“新闻投诉委员”会接受了该否认。

2010年——1月下议院媒体委员会说，《世界新闻报》管理层对电话窃听不知情是难以置信的，但是5月库尔森成了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通讯总监。

116 窃听指控堆积如山：来自于女演员西耶娜·米勒（她赢得了100,000英镑的调解费）、乔治·盖洛威议员、工会领袖鲍勃·克劳、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议员

克里斯·布莱恩特、职业球员瑞恩·吉格斯和记者布兰登·蒙塔古。

2010年12月——皇家检察署声明不会继续进行起诉，尽管普里斯科特和其他人强烈呼吁库尔森辞职，但卡梅伦首相坚持为他辩护。

2011年——1月库尔森辞职。3月三位《世界新闻报》的资深记者被捕，但到了9月份被保释出来。新闻国际公司开始致歉。压力继续增加。瑞恩·吉格斯开始了法律行动，安迪·格雷接受了20,000英镑的协调费。普雷斯科特呼吁一场公开调查。

7月4日——电闪雷鸣！他们窃听处于失踪状态的米莉·道勒的电话的证据浮现，并误导她的父母一直认为她仍然活着。

7月5至6日——有关苏哈姆父母、7/7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牺牲的士兵的家属索赔形成。但是默多克依然支持布鲁克斯。

7月7日——新闻集团宣布关闭《世界新闻报》。

7月8日——库尔森被拘押，前皇家编辑克莱夫·古德曼也被拘押（拖欠警察的罚款）。 117

7月12日——苏格兰场助理局长约翰·耶茨（负责2009年不重启调查的决定）对议会说他不会辞职。

7月13日——默多克撤回了对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投标。

7月14日——前《世界新闻报》执行编辑尼尔·沃里斯被拘押。默多克在属其所有的《华尔街日报》上说，“一些小的错误已经铸成。”

7月15日——布鲁克斯辞职。

7月17日——大都会警察局局长保罗·斯蒂芬森爵士辞职了，紧随其后的第二天助理局长约翰·尤亨也辞职了。现在据传恋童癖受害者沙拉·佩恩的妈妈——回到这个事件的起点——曾被她的“朋友”布鲁克斯窃听电话。

首版发行于《社会主义工人》(爱尔兰)，2011年8月

后 记

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本译作，其原著是译者五年前在伦敦街头一家特别的书店里遇到的一本小册子。从发现它，到阅读它，再到翻译它，已经是一个跨越大洲的故事。而要回顾从遇见它到懂得它的历程，也应该追溯比五年时光更长的往事……

“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欧洲学习交流”，这是我的导师郝立新教授多年前对我的勉励，也是我念书时心里默默种下的一颗种子。记得郝老师还把他珍藏在办公室里的一幅英文版的欧洲地图赠送给了我，我每次打开它，除了按图索骥地将世界文明史的大事记对号入座之外，就是好奇地遐想社会主义的故乡、马克思主义的摇篮今天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有机会跟随导师的足迹来到英国访学时，同时到访伦敦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臧峰宇博士。他到伦敦国王大学访学，很快制定了整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地图，寻访马克思的足迹，采访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浏览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店和图书馆。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伦敦街头的一家左翼书店BOOKMARKS。这家书店的橱窗就摆放着马克思的头像，每年七月还会贴上激进左翼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 Party）主办的马克思节（Marxism Festival）的广告。臧峰宇博士有着新闻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学科背景，因此他很自然在书架里挑出了一本写有 A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media 标题的小册子给我。

我当时正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媒体中心访学，该校的传播和媒体研究所（CAMRI）实力雄厚、名师云集，我在各种课程学习中得以深入了解西方媒体的各种面向。最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学校发展历史上有着“工人的大学”美誉的左翼传统，该校新闻传播的左翼批判研究源远流长。随着几代学者接力打造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主题，还有其创办的杂志《媒介、文化和社会》日益占领学术高地，逐渐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标识性的“威斯敏斯特媒体研究学派”。翻开这本小册子细细读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我在课堂上聆听到的对媒体的批判，在某些程度上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在这个最早发展起报业等新闻媒体的国度里，有了这些理论武器，才能在

电视上收看BBC创意发达的各类节目时，在地铁等公共场所里浏览标题花哨的各大报纸时，还有遭遇无孔不入的广告铺天盖地袭来时，可以透过纷纭复杂的表象把握媒体的本质而不至于迷失。回国之后，与从美国访学回来的任孟山博士等几位同事交流时，迸发出了翻译一套西方左翼媒体批判前沿丛书的念头，于是有了之后的一系列策划选书、申请经费、联系出版等后续环节。

整个过程得以顺利开展主要是得到了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付教授的鼎力支持，她听到我们的动议后，高度重视、周到安排、全速推进，希望达成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标志性年份出版这样一套具有标志性译著的愿望。更难忘之前与张教授一起探访伦敦北郊海格特公墓，瞻仰马克思墓碑时的动情时刻。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共同的初心，促成了这本小册子和这套丛书的成形。

翻译是一件让我觉得妙不可言也苦不堪言的事情。作为非英语专业的学习者，我那点浮潜功力得益于从当学生时开始在《英语沙龙》杂志上一篇又一篇的小豆腐块开始起步练习，这要感谢吴龙森社长对年轻人给予的信任和历练。从翻译清新短文到长篇著作的历程，注定充满了无数次化蛹成蝶的蜕变。每一次对自己的那一丝信达雅的期许近乎崩溃的时候，我就会向英语科班出身的同学加好友徐莹博士发出求援呼唤。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的博士，也讲授《媒体外交》等课程，对她来说每一个挑战仿佛都是一次绝佳的磨砺，得到她第一时间斗志昂扬的回应，我总能体验到绝处逢生、满血复活的感觉。我将对她的感佩之情嵌进了字里行间，其中也渗透着我们友情的点点滴滴。

译稿完成之后，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老先生的关切指导。他虽然年届九十，仍笔耕不辍。尽管他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人大的校园，却通过丰富多样的媒体渠道保持着宽广的视野、通畅的资讯。之前我从英国给他打越洋电话问候，他总是能一语中的地评点媒体报道中的英国时事。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对新媒体等技术工具跟进得很快，毫不落伍。现在他迷上了微信，经常用微信指导晚辈，还给大家的朋友圈点赞，玩得和年轻人一样溜。他对这本小册子里讨论的西方媒体的蓬勃表象和重重危机深表赞同，并伏案敲字在电脑上完成了审读意见。感谢陈老师亲力亲为地对一代又一代后辈的大力指导！

最后要感谢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编辑部的曾婧娴老师，她是二胎妈妈，仍能面不改色、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进度安排合同签署、书稿校审等等繁复艰辛的工作，还经常四两拨千斤巧妙地化解了险情。我无法想象超级妈妈的工作状态，唯有奉上我的敬意。在校对书稿的过程中，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白宇、姜娜、黄晓虎、刘丽晓、张彬、回梦晨、许梦菲、刘婷、李洁、张洋、许博卿等同学也参与了讨论和校对，其中刘丽晓同学还试着翻译了本书附录的相关部分。这样

安排，也是希望培养他们的理论素养、国际视野、前沿意识，期待他们能从中获益良多。

每一次遇见的背后都有一张隐秘的路线图，每一种懂得都是坚守者蓦然回首的相识相知。翻译出版这本小册子，我确实没有精心策划过故事的开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如既往地收获了恩师、同仁、学生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关爱与支持。我想有了中文版的面世，这本小册子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引来更多的读者加入对话，希望这个故事因此而远远不会结束……

杨 倩

2018年8月

Will the Revolution be Televised? A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Media

Copyright ©John Molyneux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1 by Bookmarks Publications

ISBN 978-7-5657-2401-5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2018

by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Press of China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524458

SS号=14524458